

01-十月宫廷政变——逮捕“四人帮”

作者 于松然

1976年9月9日，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驾崩；但他死后不到一个月，中共中央副主席**华国锋**与军委副主席**叶剑英**、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统率“御林军”的中央警卫局局长**汪东兴**联手，发动了震惊中外的宫廷政变，清除了毛泽东遗孀江青为首的毛左集团。叶、华、汪密谋设下圈套，以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为名，赚毛的亲信**江青**、**张春桥**、**王洪文**、**姚文元**等所谓的“四人帮”入彀。

10月6日晚，当王洪文、张春桥应召先后驱车来到怀仁堂参加会议时，华国锋以党主席身份，宣布对其“隔离审查”。藏于屏风后面的武装军警，闻声迅速出击，将他们逮捕。与此同时，张耀词带领一中队人马，到春藕堂逮捕了江青；见姚文远迟迟未到，汪东兴遂派数十名军警，到姚家将其逮捕。此外，毛的侄儿（毛的联络员）**毛远新**和毛的追随着、红人**迟群**、**谢静宜**、**金祖敏**等人，也相继被捕。接着，他们以软硬兼施的权术，迫使毛的党羽**马天水**、**徐景贤**、**王秀珍**等上海帮躬身就范，失去了反抗能力。不久后，三人相继落网。可以这么说，由于软硬兼备，计划周密，叶、华发动的宫廷政变，兵不血刃，干净利索地取得了胜利！

十月宫廷政变是在极其秘密的“暗箱操作”中成功的，其鲜明的阴谋性、非法性，体现了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即马列毛主义的正统性。

早在毛泽东发动“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之初，特别是在毛失去口头表达能力之时，中共宫廷已形成了势不两立的两大集团：以江青为首的左派集团和以叶剑英为首的右派集团——前者以软实力“舆论一律”，号令全国，后者以硬实力坚甲利兵，虎视眈眈。

周恩来死后和邓小平面临被打倒的1976年1月下旬，毛泽东突然确定政治局委员华国锋任国务院代总理并主持中共中央日常工作。华当时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和国务院第六副总理，按等级序列上位，远轮不上他。但在毛说不二时代，他超越了中共中央副主席邓小平、王洪文、叶剑英、朱德、张春桥等政治局常委而跃居第一副主席高位，跨过了邓小平、张春桥、李先念、陈锡联、纪登奎等国务院副总理而登上代总理宝座，4月又被任命为总理。这种非序列上位的任命，引起了江左集团的强烈不满。按照等级序列，在邓小平面临被打倒情势下，王洪文接任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张春桥接任代总理，是顺理成章的事；但在接班的节骨眼上，“半路杀出个程咬金”来，使江左集团的王、张自然接班，化为泡影。

病中的毛泽东，头脑还没有完全糊涂。如果他按序列让王、张上位，一定会引发叶右集团的强烈反弹，复制武曩末年神龙政变故事（1），随时都可能发生。在走头无路的情况下，他突然挑选没有派系后盾的华国锋为接班人，借以缓解左右两派的冲突，为最终实现华国锋——江青——张春桥三架马车接班架构创造条件。但愚蠢的江青、张春桥等“四人帮”左派集团，不懂毛的苦心，却把“程咬金”当成他们获得最高权力的拌脚石，对其工作进行百般

挑剔，生生地把华国锋推向右派集团，为叶、华联手创造了决定性的条件，从而把自己推到了灭顶的边缘。

历史已经让人们看到，早在“批邓”之初，政变之声早已悄然起于行伍之中。得到多位高级将领支持的**宋时轮**上将，扬言要发兵“清君侧”；福州军区司令**皮定均**中将，对在福州治病的被毛罢黜的前总参谋长**罗瑞卿**大将说，你叫我们怎么打，我们就怎么打；**王震**上将在叶剑英元帅家中，嚷着要叶下令动武；**杨成武**上将带着**聂荣臻**元帅的口信，潜入叶剑英元帅家中，要叶动手。此时，“病”而不休而按兵不动的叶剑英，早已成竹在胸：他派王震以老上级的身份“造访”了“御林军”司令**汪东兴**少将，利用汪与江青的矛盾，使汪听命于叶，又派**苏振华**上将做了他的老部下、重兵在握的北京卫戍区司令**吴忠**少将的工作，使吴向叶表忠，等等。叶还暗中调兵遣将，单等毛驾崩后下手。据报导，历史记录了毛驾崩后叶、华、汪“下手”的过程：

经过多日试探和构通，在毛泽东死后的1976年9月21日，叶剑英应约来华国锋住处，密谋解决“四人帮”问题，并对解决方案达成了共识。

9月26日晚，华国锋根据叶、华共识，与志同道合的李先念、吴德商量解决“四人帮”问题的实施方案。三人认为：召开中央全会投票解决没有把握，召开政治局投票解决，虽有把握，但场面激烈，易生不测；最后商定比较稳妥办法是：利用华的合法权力和叶的权威，“采取隔离审查的办法”。

10月2日下午，叶剑英又来到华国锋办公室，要华尽快解决“四人帮”。此前，他对汪东兴说：“**该摊牌了，不能失掉时机，兵贵神速，乘人之不及！**”

10月4日下午，在汪东兴的办公室，汪把抓捕“四人帮”的行动方案向叶详细作了汇报：确定以召开会议的名义把王、张、姚找来中南海怀仁堂，名义是：一、讨论《毛选》第五卷出版问题；二、讨论建造毛主席纪念堂选址问题。

在华国锋家里，华同汪东兴、吴德进行了粉碎“四人帮”前的最后一次商议。三人商定：

一、按华国锋、叶剑英、汪东兴已议定的方案执行：以召开政治局常委会研究《毛选》第五卷出版问题的名义，通知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到会；华国锋、叶剑英坐镇中南海怀仁堂指挥；当王、张、姚到会时，由华宣布对他们进行隔离审查，然后由汪东兴组织的军警将他们逮捕；汪派副手张耀祠到江青住处，将其逮捕。

二、对迟群、谢静宜、金祖敏等人的隔离审查，由吴德和吴忠负责实施。

三、中南海内如果出现了意料不到的问题，由吴德组织卫戍区的部队支援。

四、由北京卫戍区军警把人民日报社、新华社、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军管起来，中央机关和迟群、谢静宜控制的清华、北大等单位，用内紧外松的方式戒备起来。

华国锋最后决定：10月10日动手。

但在10月5日下午，叶剑英突访华国锋，要华提前行动。华遂决定6日晚8时动手。

10月6日晚8时左右，“四人帮”被顺利“粉碎”，前后仅用35分钟。

当晚9点，耿飚按照叶剑英的命令，带一营武装，接管了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华社等新闻机构，摧毁了江左集团的软实力。

《韩非子》曰：“**事以密成，语以泄败。**”叶、华“暗箱”中的阴谋活动，终于大获成功。

为了给这种既违宪又违党章的非法阴谋活动披上合法的阳谋外衣，在逮捕了“四人帮”及其爪牙之后的当晚10点，右派集团立即在叶剑英的西山住处，召开了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除追认叶、华主导的非法阴谋行动为合法外，还根据叶剑英的力荐，任命华国锋为

中共中央主席和国务院总理。会议结束于第二天的凌晨 4 点。

在上层精英的笔下，这些非法的阴谋活动，变成了“英明领袖”华国锋的智慧结晶和领导艺术！

1976 年 10 月 21 日，北京 150 多万未必了解真相的群众，在新中央的指挥下，上街欢庆“粉碎‘四人帮’”的伟大胜利。此刻，各地包括笔者在内的芸芸众生，才从广播里听到了这个令人震惊又令人欢欣鼓舞的消息。

(图 23-1)

粉碎“四人帮”是福还是祸？是合法还是非法？这些都用不着你老百姓去操心，更不许你说三道四，因为，党中央的“英明领袖”已经为你铺摆好了。宫廷政变的全过程，是中央几个人自行“代表百分之九十五以上人民”行施权力的全过程，反映出马列毛主义的正统性：当权力失衡时，重新分配权力不是靠选票，而是靠阴谋、

政变和火并。马列毛主义的正统性表明，非法的宫廷政变，其“合法性”是不容置疑的，尽管从历史的角度观察，粉碎“四人帮”是次小小的进步。



图 23-1：欢庆粉碎“四人帮”

02-两个凡是暨文革第八轮大屠杀

作者 于松然

粉碎“四人帮”后，右派逐渐得势，要求邓小平出山的呼声也越来越高，新左派华国锋的地位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为了巩固既得利益，消除右派的威胁，他与汪东兴一起，提出了一个巩固权力、扼制右派东山再起的计划：“两个凡是”。

1977 年 2 月 7 日，“两个凡是”正式出炉：《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和《红旗》杂志在两报一刊社论《学好文件抓住纲》中，把“两个凡是”表述为：“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必须拥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要始终不渝地遵循。”——这就是继承毛泽东遗志、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坚持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理论和走文化大革命路线的华国锋思想。华的这种思想，在粉碎“四人帮”以后，便裸露无余：

粉碎“四人帮”后的第三天，即 10 月 8 日，华国锋在中共中央召开的打招呼会议上宣布：“批判‘四人帮’一定要按照毛泽东的指示办”，“‘四人帮’的核心问题是阴谋篡党夺权”，解决“四人帮”“是毛主席关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伟大理论的一次伟大实践，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胜利。”在 9 月 18 日毛的追悼大会上，华国锋表示，

“要以阶级斗争为纲，坚持党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基本路线，巩固和发展文化大革命”的胜利成果。在解决“四人帮”后不久，华国锋就在一次讲话中表示：“要保卫和发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胜利成果，继续搞好教育革命、文艺革命、卫生革命、科技战线的革命和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工作，扶植社会主义新生事物，限制资产阶级法权，真正把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任务落实到基层。”在3月中旬的中央工作会议上，他又说：“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应当正确对待。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七分成绩，三分错误。七分成绩，是在毛主席领导下取得的；三分错误，是林彪、陈伯达、‘四人帮’干扰破坏造成的。如果不这样看，就会发生有损我们旗帜的问题。”直到1977年8月召开的中共十一大上，他强调说：“毛主席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最大贡献”，就是“完整地创立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伟大理论，指明了无产阶级革命胜利的国家，如何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建设社会主义的根本道路。”他认为，“这是当代马克思主义最重要的成果”，是中国“亿万群众进行胜利战斗的光辉旗帜。”

显然，做为文革的既得利益者华国锋，继承毛泽东遗志、坚持走文革路线是很自然的事。

对此，三十多年后，一些上层精英，出于树华反邓的政治需要，硬把“两个凡是”的社论说成是“汪东兴提议写成的”，甚至“厘清”众议说：“‘两个凡是’并非由华国锋最早提出，也不是为了阻挠邓小平复出。”但历史的记录证明：这种“厘清”站不住脚。

1977年1月21日，华国锋在中央宣传口的讲话提纲中，明确提出：“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必须维护，不能违反；凡是损害毛主席的议论，都必须坚决制止，不能容忍。”这是2月7日“两个凡是”经典表述的最早版本，而汪的表述，不过遵命而已。之于“两个凡是”是否是“为了阻挠邓小平复出”，看看左右两派角力，你就会得到答案。

粉碎“四人帮”后，党内右派根据各自的政治诉求，迅速分裂成新的左右两个派别集团：一个是以老左派华国锋、汪东兴、吴德为核心的新毛左集团，他们坚持毛泽东制定的基本路线，以“两个凡是”为武器，保卫文化大革命的“胜利成果”；一个则以老右派邓小平、叶剑英、胡耀邦为核心的新右派集团，在坚持毛泽东制定的基本路线的同时，用“实践是检验真理唯一标准”去批判“两个凡是”，颠覆文化大革命，宣布其为“浩劫”。角力结果的历史是：新右派取得了胜利，新左派一败涂地。一败涂地后的新左派归宿是：华国锋被迫宣布“第一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结束”，接着在1979年，被摘掉了“英明领袖”的桂冠，“请”出领导核心；汪东兴、吴德以及反对邓小平复出的陈永贵、吴桂贤等重臣，先后被逐出权力中心，或降职他就，或黯然退休。

邓、华两派的角力，被上层精英们大书特书，成了那段历史的主轴。但史学家们好像有意放大“两个凡是”扼制右派东山再起的一面，却有意忽略甚至掩饰它的另一面：镇压。

大凡在民主政体下，新政府上台、新官上任或遇节假日，许多当权者都会大赦天下或抚慰百姓，以示体恤和宽容；但毛泽东的基本路线是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反对体恤和宽容。因此，在毛泽东时代，大凡新政府上台、新官上任或新政出台，必大砍大杀之，借以警告天下，如镇反、肃反、“一打三反”等；每到节假日之前，如“五一”、“十一”、元旦和春节等节假日，必统令各地，大开杀戒，警示百姓，以立政威。——这就是中共独有的“政权就是镇压之权”的赤文化。“老实人”华国锋新官上任，自然也不能例外。

深感地位不稳的华国锋，不仅受到了邓右派的压力，更受到一些右派暗中支持的“反革命分子”的挑战。1977年1月，一些右派支持者、异己人士和持不同政见者，在周恩来逝世一周年之际，举行了声势很大的纪念活动，要求平反“四五”天安门事件，追究华国锋及其助手吴德、陈锡联、吴桂贤等领导人的责任，公然向僵尸毛泽东叫板，令华国锋十分紧张。于是，他与汪东兴等人密谋后，“两个凡是”便出笼。其中，坚决镇压反革命是毛泽东思想的核心价值，右派不能、也不敢不认同。于是，在右派的配合下，他掀起了文革第八轮大屠杀的高潮，以儆效法者！

1977年2月22日，华国锋签发中共中央“中发[1977]六号”文件，转发了《全国铁路工作会议纪要》，发出了第八轮也是文化大革命最后一轮大屠杀的号令：“**对攻击毛主席、华主席和以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现行反革命分子，要坚决镇压**”；“**对极少数罪大恶极、证据确凿、不杀不足以平民愤者，则杀之**”。该《纪要》是文革期间镇压反文革义士《公安六条》的继续，因而是毛泽东“政权就是镇压之权”思想的继承和发展。据说，在贯彻文件精神过程中，有成百上千的异己者和持不同政见者等志士仁人，遭到华国锋为首的中共党的残酷镇压，并以“恶攻罪”先后判处死刑。其中包括上海青年**王申酉**、江西女青年**李九莲**和同情李的女教师**钟海源**、吉林的**史云峰**和因批评政府而上书华国锋的湖南教师**武文俊**等英烈。

文革第八轮大屠杀究竟杀了多少？近几年有书称，只杀了44人；这样，如果中共想要治罪的话，“**成百上千**”的传说，便可界定为“谣言”，并加以刑事追究。在“档案死不解密，又不许体制外调查”的社会里，许多“谣言”，往往在档案解密后，会自动变成真言。这些现象，在共产党政府倒台或改制后的国家里，屡见不鲜。但应当肯定的是，第八轮大屠杀的规模，远比毛泽东、周恩来在文革中进行的前七轮大屠杀要小得多。

据悉：日本《朝日新闻》曾在2001年11月2日，发表了篇题为“前主席华国锋申请退党”的文章。文章说华国锋认为：“**现在的共产党，和过去的国民党没有什么区别。**”

尽管这篇文章说法的真实性尚待考证，但它的确反映了丧失权力者思想的失落和乖谬。既得利益者华国锋，本能地不会承认，“解放”后的共产党，特别是文革中的中共，远比“**过去的国民党**”专制、独裁得多，因而干的祸国殃民的事，远比国民党多得多！既得利益还会使华国锋闭眼不看，**过去的共产党**曾使许多中国人，每天都在批、斗、杀的红色恐怖中度日，大多数人都过着吃不饱、穿不暖的生活，而改革开放后的共产党，虽然腐败，但大多数中国人，却能吃得比较饱、穿得比较好，自杀、虐杀和被枪决的人，也远比毛泽东时代少得多。不可否认的是，远比毛泽东时代富裕、自由的邓小平时代，因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导致腐败丛生和分配不公，使民怨沸腾，从而使包括华国锋在内的一些政治家和文革余孽们，高调怀念毛泽东时代。显然，这种怀念不是愚昧，便是别有用心。笔者由此认为：无论是过去的共产党，还是现在的中共，都是一党专政者，因而都是中国老百姓人身的绑架者和民意的奸污者，他们解决不了迫害、腐败和共同富裕等社会问题；怀念毛泽东时代，是某些政治家和文革余孽们，利用民众的反腐情绪达到某种政治目的的手段。历史已经证明、必将继续证明，尽管毛、邓两个时代有所不同，却是一脉相承的，因而，它们的不同是承前启后的结果：**毛泽东时代的特征是独裁、迫害、经济滞后加百姓共同贫困，邓小平时代的特色是专制、腐败、经济高涨加官民贫富悬殊！**华国锋怀念毛泽东时代，不过是权力斗争中丧失权力者的啾啾哀鸣而已。

03-拨乱反正——邓小平拯救中共

作者 于松然

毛泽东的文化大革命，给中国人民造成了巨大灾难，使中国共产党失去了绝大部分民心，党心、军心也处于风雨飘摇之中。为了**拯救**中国共产党，高层人物都进行了反思。尽管他们反思的深度、广度和角度不尽相同，但不谋而合的是，他们反思是**保权反思**，亦即在保住共产党权力基础上的反思，犹如他们当年反思大跃进恶果那样。坚定的马列主义革命家邓小平，自然也不能例外。

为了拯救中共，邓小平的反思表现在两个方面：在政治上他拨乱反正，经济上他改革开放。为此，他设计了两套实施方案，并利用权力，力排干扰而获得了成功。

1、拨乱反正——平反冤假错案

邓小平在政治上的批左保右，其中之一就是拨乱反正，即拨毛左文化大革命之乱，反(返)确保右派官僚特权阶级永远掌权之正。为此，他一切入，便重拳出击毛左顽固势力：首先，别出心裁地“改正”了右派分子的“反革命”属性；继而，“解放”成千上万个被毛左集团定为“反革命”、“反党分子”的老老干部；接着，又平反了大量普通老百姓中的冤假错案。邓氏的这一招，也确实高明，不仅为中共和他本人争得了党心、军心和民心，也为历史留下了一页能被后人称颂的篇章。

在平反冤假错案中，胡耀邦是个举足轻重的人物。**胡耀邦**(1915~1989)，湖南浏阳人，是中国共产党、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和中华人民共和国重要领导人之一。1930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并到湘赣革命根据地工作，被誉为“红小鬼”。1957年任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中央第一书记，1964年任中共中央西北局第二书记、陕西省委第一书记。文化大革命中受到迫害。1975年重新工作后，任中国科学院党组织负责人。因紧跟邓小平进行整顿而遭到毛的批判。粉碎“四人帮”后，曾先后任中共中央党校副校长、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中央宣传部部长、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三书记、中央委员会秘书长等职。1980年2月，在中共十一届五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委员会主席、总书记。其间，他又紧跟邓小平，组织、推动了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唯一标准**”的大讨论，为邓小平战胜以华国锋为首的新毛左集团，做出了贡献。

胡耀邦对中国的重大贡献是平反冤假错案。在他的组织、推动、领导和邓小平的支持下，自1979年开始，从中央到地方，先后开始了平反冤假错案工作。**据报导：**

1978年9月19日，中共发表了《关于全部摘掉右派分子帽子决定的实施方案》。全国除章伯均、罗隆基等五六个人外，其余五十五万多右派分子，全部“改正”，变成了享受“人

民”待遇的公民；但《方案》拒绝承认毛泽东发动反右运动时所采用的“引蛇出动”“阳谋”的卑劣性。

11月14日，经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批准，中共北京市委宣布：1976年清明节期间，群众到天安门广场悼念周恩来、声讨“四人帮”的“四五怒潮”，完全是革命行动，应予平反；但却回避了声讨毛泽东暴政及其对“四五事件”的“反革命”定性的独断。

12月18日至22日，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上，推翻了毛泽东要“天天讲，月月讲，年年讲”阶级斗争的规定，中止使用长达二十八年的“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毛左口号。

1979年1月11日，中共中央作出了《关于地主、富农分子摘帽问题和地、富子女成分问题的决定》，摘掉绝大多数“地、富、反、坏”分子的帽子，给予人民公社社员待遇。

5月3日，中共中央批转解放军总政治部《关于建议撤销1966年2月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的请示》，并发出通知，决定撤销中央于1966年4月批发的这一纪要。总政治部在请示报告中指出，《纪要》是林彪、“四人帮”篡党夺权阴谋的一个步骤，推行的是林彪、“四人帮”极左的机会主义路线，它的贯彻和推行带来了灾难性后果；但却只字不提毛泽东组织和亲自修改《纪要》的决定作用。

6月29日，中共中央同意中共北京市委《关于“三家村”冤案的平反决定》，正式为所谓“三家村反党集团”冤案彻底平反，撤销对邓拓、吴晗、廖沫沙等三人所作的结论。尽管人们不会忘记：毛泽东曾说“我不相信，在文化革命中的问题只是吴晗问题，后面还有一串串‘三家村’”和怒斥邓、吴、廖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的谈话之后，“三家村”遂遭灭顶之灾；但这一切，都被《决定》推到了林彪和“四人帮”头上。

1980年9月29日，中共中央批转公安部、最高人民检察院、最高人民法院党组《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案件的复查报告》，决定为“胡风反革命集团”一案平反：凡定为胡风反革命分子的，一律改正，恢复名誉；凡因“胡风问题”受到株连的，要彻底纠正。同年11月3日，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改正了1965年对胡风的判决，宣告胡风无罪。

最引人纳罕的是，1982年8月23日，中共中央发出了《关于为潘汉年同志平反昭雪、恢复名誉的通知》。潘汉年是中共派遣到国民党内部特工负责人。经过多年经营，他在国民党高层中，安插了多名情报员，获得了大量情报。在抗日战争中，他与日、伪汪精卫合作，分享情报，为中共“一分抗日、二分应付、七分发展”的战略，作出了重大贡献。内战中，他为中共高层提供了大量国民党军政活动情报，使毛泽东得以知彼知己，从而把毛推上了“用兵如神”神坛，为中共战胜国民党最终夺取政权，又作出了重大贡献。“解放”后，他被任命为上海市副市长。因嫌官小，他上书毛泽东，陈述他的贡献。毛见书后，勃然大怒。遂被毛以“秘密投降了国民党，是CC派人物”的罪名，逮捕入狱，监毙于狱中，潘手下的知情人，也被一网打尽。《通知》宣布：撤销对潘汉年的审查结论，提请最高人民法院依法撤销原判，为潘汉年平反昭雪，恢复党籍；追认潘汉年的历史功绩，公开为他恢复名誉。九十年代，中共批准30集《潘汉年》电视剧在全国放映，间接肯定潘与日、伪合作的“历史功绩”；但播放后不久，又禁止放映。

到1982年底，平反的冤假错案高达300多万件：约47万名共产党员恢复了党籍，数以十万计的干部重新安排了工作；本书所列的血案、冤案，基本上都得到了平反。其中，被毛左绞杀的政敌刘少奇、彭德怀、陶铸、贺龙、许光达、阎红彦、陶勇等高干和将领，被毛左枪杀的刘文辉、林昭、遇罗克、陆兰秀、张志新、王申酉、史云峰、李九莲、陆洪恩和死里逃生的马思聪、王容芬等志士仁人，也都相继得到了平反。

胡耀邦等人的历史功绩在于，他们所组织、领导的平反冤假错案工作，告慰了上百万个冤魂，使上千万伤残者、上亿万个株连者得到了精神上的慰抚。但在“四项基本原则”制约

下，他们不愿追查制造冤假错案的从中央到地方各级党、政、军官僚们的责任，更不愿去查追冤假错案的直接制造者以及那些打手、刽子手等痞子、流氓无产者的罪恶，也就是说，他们即不愿从保障人权高度，去追根制造冤假错案的源头毛泽东的独裁和马列加秦始皇主义的封建本质，更不愿从健全法制高度，去追诉无产阶级专政体制反人类的邪恶本性。

由此可见，胡耀邦和邓小平的平反冤假错案，是文革浩劫之后拯救中国共产党的有限反思，是收买党心、军心和民心的一种策略，与封建帝王玩弄的“宽猛相济”权术，没有什么不同。基于这种保权的有限反思，胡耀邦同邓小平一样，都是马列主义亦即专制主义革命家，而非共和主义亦即民主主义革命家。因此，他们不会也不可能从根本上消除冤假错案。历史业已证明，大规模平反冤假错案之后，中共历代领导人，都在利用专政权力，继续制造新的冤假错案。例如，“六四”惨案、镇压法轮功案以及包括诺贝尔奖金获得者刘晓波在内的大量文字狱案，等等。

2、改革开放——走官僚资本主义道路

在毛泽东独裁统治下，中国闭关锁国，舆论一律，老百姓对内能知道的是“大救星”、“社会主义好”等等，对外能知道的是资本主义国家的人民“处于水深火热之中”，正在热切地盼望着中国共产党去解放他们，等等。上层权贵和精英们，与老百姓却不一样。他们都能从外交、外贸等外事活动中，知道外部世界许多真实信息。但在党的伦理共识作用下，他们都能戴上有色眼镜观察世界，做到内外有别：对党和政府，如果十件事办错了九件，他们会自觉地运用“一俊遮百丑”的思想，把办好的那一件事无限放大，反复向老百姓灌输，社会主义就是好；与此相反，对西方敌国，如果对方十件事办好了九件，他们会自觉地运用“攻其一点，不计其余”的利器，把对方办砸了的那一件事无限放大，反复告诫老百姓，资本主义世界就是那样反动、那样落后。然而，当他们在文化大革命中受到冲击、批斗后，他们开始有所反思，有所醒悟，有色眼镜逐渐退色。以邓小平为首、相对开明的上层权贵们，开始用退色眼镜去观察内部和外部世界。

在退色眼镜观察下，邓小平们“发现”，外部世界十分精彩。二战后的三十多年间，西方自由世界在战争的废墟上，突飞猛进，经济繁荣，现代化、城市化已高度发展，老百姓家庭都先后进入了小汽车和电脑时代。二战中战败的德、意、日等法西斯国家，已发展成了一个经济高度发达百姓普遍富裕的民主国家。在经济总量上，1960年日本已超越1946年曾高其两倍的美国，到1968年，又超越世界各国，发展成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据报导：1950年，中国GDP占世界经济总量的4.7%，到1976年，下滑到1%；同期，日本由2.4%上升到6%。资源匮乏、技术落后的台湾、南韩、香港和新加坡，也迎头赶上，纷纷进入发达国家行列，被誉为亚洲四小龙。其中，人口600万、面积仅为祖国万分之1.15的香港，1980年的经济总量，已达到祖国的六分之一。邓小平们关注的资本主义世界，已完全看不到“水深火热”的样子，自然也不好意思再说什么“我们去解放他们”的谎言了。反观国内，他们“发现”，自“一化三改造”起，先后历经了“大跃进”、“人民公社”、“调整、充实、巩固、提高”和“抓革命、促生产”等各个发展阶段，国民经济像老牛拉破车一样，迤迤蜗行，广大农民在“瓜菜代”中挣扎，城市居民在贫困中煎熬，用邓小平的话来说：“中国社会，实际上从一九五八年开始至一九七八年二十年时间内，长期处于停滞和徘徊的状态，国家的经济和人民的生活没有得到多大的发展和提高。”而在当年，中国的人均GDP，在世界149个国家和地区的排名中，也从1948年的40位，下滑到1980年的145位，为全世界倒数第五位。国内外的强烈反差，使邓小平们认识到：拨乱反正、平反冤

假错案，虽能争取党心、军心和民心，但只有短期效应；就长治久安而论，要拯救中共，必须关注民生，发展生产，改善和提高国民生活水平。于是，邓小平勇敢地发出了“**贫穷不是社会主义**”的呼号，他劝告同僚，要“**老老实实承认落后**”，告诫那些坚持毛左思想的人，“**长得很丑却要打扮得像美人一样，那是不行的。**”

三十年的经验证明，计划经济模式的一化三改造，其结果是少慢差费，落后三十年；而文革中所谓的“继续革命”和“抓革命、促生产”，却把国民经济“促”到了崩溃的边缘。1978年11月，以邓小平为首、相对开明的上层权贵们，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上，提出了拯救中共的另一重大举措——**改革开放**，即用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模式，去改造毛的僵硬的社会主义计划模式，并利用权力，排除干挠，最终取得了成功。

1978年，在邓小平中共的默许下，安徽省凤阳县**小岗村**，十八户农民签订“血”约，揭“书”而起，砸开了人民公社枷锁，率先分田到户。1979年9月，中共在四中全会上，通过了《**关于加快发展农业若干问题的决定**》，承认了小岗农民分田到户的合法性。1980年9月，中共下发《**关于进一步加强和完善农业生产责任制的几个问题**》，肯定了包产到户的社会主义性质。到了1983年，中共在全国范围内全面推广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推翻了毛泽东的农村人民公社体制，砸开了自农业合作化以来套在农民身上长达30年的枷锁。短短几年间，到1985年，就解决了毛泽东二十多年无法解决的温饱问题。

1979年，邓小平的中共，决定在深圳、珠海、厦门、汕头试办经济特区，实行“**特殊政策、灵活措施**”，吸引台资、港资和外资，推动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的进程。接着，在1984年4月，他们又进一步开放大连、秦皇岛、天津、烟台、青岛、连云港、南通、上海、宁波、温州、福州、广州、湛江、北海这14个港口城市，兴办经济技术开发区。1985年起，又相继开放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闽东南地区和环渤海地区经济开发区。1988年，增辟了海南经济特区。1990年，又做出了开发上海浦东新区的决定。经济特区和经济技术开发区的建设，引领了第二、三产业的高速发展。中国经济总量，从1980年3,015亿美元，增加到2010年的5.879万亿美元，**30年增加了19.5倍**。

由于邓小平的改革开放，国民经济快速增长。到2010年，中国经济总量已取代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直到今天，中共才真正让中国人得到了真真切切的实惠：基本上解决了温饱问题；尽管还有贫困人口，但无论是农村最贫困的农民或者是城镇中的最贫苦的居民，他们都比毛泽东时代好过得多！

然而，由于中共拒绝政治改革，坚持一党专政，坚持走官商一体的**官僚资本主义道路**，亦即所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导致权钱交易，腐败丛生，产生了一批官僚背景的红色资本家和拥有大量隐形资本的官僚特权阶级。二十一世纪的中国，**红色官僚资本家和官僚特权阶级**，左右着中共党和政府，掌控了国家政治走向和经济命脉，从而使中国社会两极分化，成为全世界贫富最悬殊的少数国家之一。

据百度文库《中国的财富分配》一文记载，中国占人口1%的富豪，掌控财富占国家总量的41.4%；又据中国科学院《2012中国可持续发展战略报告》称，中国年收入2,300元以下的人口为1.28亿，占总人口的9.62%，拥有财富仅占国家财富总量的0.63%，换句话说，**占中国总人口10%的贫困阶层，拥有财富不足国家总量的1%**。

贫富的巨大反差，使中国社会处于极不稳定状态。据报导，由于官僚腐败，官民对立，民怨沸腾，每年群众闹事事件高达十万起以上，自杀数十万件。

为了“维稳”，历届领导人在上台伊始，都会一手举枪，坚决镇压老百姓的和平抗腐，一手举廉，信誓旦旦地反腐治贪。但由于他们拒绝群众监督、顽固拒绝公开个人财产，腐败呈愈反愈腐态势：八十年代，腐败黑金规模还在数万、数十万元上徘徊，九十年代，黑金规模已扩大到数百万元之上，进入到二十一世纪，黑金已上升到数千万、数亿乃至数十亿元的规模。这是为什么呢？有识之士早已指出，党内自我反腐是“以黑制黑、以腐反腐”，因而无效的。因为，中共反腐的前提是巩固一党专权，而一党专权的前提是党内官员利益均衡。但利益无法均衡。当今官场的现状是：权大者腰缠亿万，可以挥金如土，权小或无权者，相对“清贫”得多。面对利益失衡，官员们的心理岂能平衡？于是，权力拜物教的权力情结便与利益大小交织在一起，引发官场权力争斗，使“特色社会主义”始终处于不稳定的振荡中。

为了“维稳”，新上任的当权者“大大”，在镇压老百姓的和平抗腐的同时，拿对手中的腐败分子开刀，借以达到巩固权力的目的。当年江泽民拿中共政治局委员北京市委书记陈希同开刀，胡锦涛重判中央政治局委员上海市委书记陈良宇，都是“法”办异己腐败分子的经典。2012年上任的习近平，为了巩固权力，也一定会效法前任，“法”办那些异己的腐败分子。由此可见，一党专权下的反腐，是权力斗争的反映，亦即权力绑架反腐，其反腐力度越大，权力争斗越激烈，其结果不是越反越腐，便是同归于尽。

在权力绑架反腐的社会里，权小者或利小者，无法用民主手段获取更大权力时，便向“最高”挑战，鼓励再来一次文化大革命。

“再来一次文化大革命”已经不是痴人说梦。由于腐败泛滥，既得利益不可能均等，权力便失去了平衡，党内外角力不可避免。当年，邓小平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用“六四”枪声终结了自由主义取向，改革开放旋向左转，走上了官商一体的官僚资本主义歧途。二十多年后的今天，腐败猖獗，贫富悬殊，民怨沸鼎，毛左余孽们借机卷土重来，力图用第二次文化大革命来终结邓的改革开放，以实现他们所谓的利益均等。与此同时，官场中失意或不如意某些高层官员和精英，如十七大政治局委员薄熙来和十八大政治局常委俞正声等人，也一步步向左转，从默许、鼓励进而配合毛左余孽们第二次文化大革命的鼓噪。新一轮角力所引发的第二次文革潜流，正在中华大地底下形成！

在第二次文革潜流中，自由主义者呼吁中共民主改革，使中国人能在“天鹅绒”(1)式的温馨和“茉莉花”(2)式的芳香的政改中受益。但为了维护既得利益，中共高层顽固不化，坚持一党独裁，坚持镇压异己者和持不同政见者，他们忤世界民主潮流而动的倒行逆施，必将把中国拖入到第二次文革或与其类似的流血革命中！

附 1、“天鹅绒”即“天鹅绒革命”，泛指没有经过大规模暴力冲突就实现政权更迭的革命。1989年11月，东欧捷克斯洛伐克的共产党政府，被和平起义的人民群众所推翻，其革命犹如天鹅绒般平和、柔滑，故而得名。

附 3、“茉莉花”即“茉莉花革命”，同“天鹅绒革命”一样，泛指没有经过大规模暴力冲突就实现政权更迭的革命。2010年12月17日，北非突尼斯共和国一名26岁青年穆罕默

德·布瓦吉吉自焚，引发了争取民主的大规模街头示威游行，导致时任总统本·阿里政权倒台。因茉莉花是突尼斯国花，故得其名。

04-审判闹剧——保毛救中共

作者 于松然

同“拨乱反正”一样，公开审判林彪，江青所谓“反革命集团”，是邓小平为拯救中共设计的另一重大举措。

1、“橡皮图章”式的审判

1980年9月，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一项特别决定，宣布审判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为此，人大常委会宣布成立最高人民法院的特别法庭和最高人民检察院的特别检察厅，负责检察和审判“两案”。这个《宪法》赋予的“国家最高权力机关”的常设机关，手持“橡皮图章”，再次充当了“国家最最高权力”的随驾扈从。早在三个月之前的6月，中共中央书记处决定要审判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案，并决定由彭真出任“两案”审判指导委员会主任，统一领导审判“两案”的工作。于是，听命于党的书记处的“国家最高权力机关”全国人大常委会，紧紧跟上，把中共中央书记处的决定改头换面成“特别决定”，然后盖上了它的“橡皮图章”。

1980年11月20日，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遵照中共决定，开庭公审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的主要成员。经过两个多月的公审表演，到1981年1月25日，对10名被告做出了终审判决。判决如下：（右图）



判处被告人原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江青死刑，缓期两年执行，以观后效，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判处被告人原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张春桥死刑，缓期两年执行，以观后效，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判处被告人原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姚文元有期徒刑20年，剥夺政治权利5年；

判处被告人原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王洪文有期徒刑20年，剥夺政治权利5年；

判处被告人原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陈伯达有期徒刑18年，剥夺政治权利5年；

判处被告人原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总参谋长黄永胜有期徒刑18年，剥夺政治权利5年；

判处被告人原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空军司令吴法宪有期徒刑17年，剥夺政治权利5年；

判处被告人原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海军政委**李作鹏**有期徒刑 17 年，剥夺政治权利 5 年；

判处被告人原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总后部长**邱会作**有期徒刑 16 年，剥夺政治权利 5 年；

判处被告人原南京军区空军政委**江腾蛟**有期徒刑 18 年，剥夺政治权利 5 年。

对于公审和判决，中外许多有识之士对其公正性提出了质疑，认为，审判是政治审判。对此，彭真反驳说，这次公审，是“**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是“**经得起历史检验**”的公正审判。果真是这样吗？

先看一下“两案”审判指导委员会是怎样“**以法律为准绳**”的。据报导：

1980 年 6 月，中共决定在党内成立的“两案”审判指导委员会（下称审委会），由彭真、彭冲担任正副主任，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江华、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黄火青、公安部部长赵苍璧及中央纪委的王鹤寿、中央军委的伍修权等人为成员，直接领导“两案”审判工作。显然，成立审委会是**以党代法**的集中表现。

在审委会的历次会议上，彭真根据中共中央的决定，多次强调了**审判工作的“大原则”**。他说：“**他们的主要罪行弄清了，林、江是头子，康、张是军师，列入起诉书的罪行，都不牵涉毛、周和中央其他领导同志的过错，这个大原则中央已批准了的。起诉书还要把周总理列入了被诬陷的领导人的名单中。**”显然，“大原则”既是有罪推定的典范，又有包庇罪犯的重大嫌疑。

审委会还将毛泽东涉案的重大事件，**界定为“错”，不是“罪”，因而不予以起诉**。毛涉案重大事件是：“对刘少奇同志定案问题”、“文艺黑线专政”、“上海一月夺权”、“二月逆流”、“七二〇事件”、“文攻武卫问题”、“杨、余、傅事件”、“军委办事组代替军委常委问题”、“中央文革代替中央书记处问题”、“诬蔑周总理所谓十一次路线斗争代表的问题”、“1976 年诬陷迫害邓小平同志的一些问题”、“天安门事件问题”、“向维特克泄密问题”等。这 13 件重大事件，都是毛泽东亲自决定、亲自领导或亲自处理的，都是严重罪行，但却被审委会预先规定为不准审判的“错”。显然，这里根本不存在什么“**以法律为准绳**”的规定。

“两案”的辩护律师是中共指定的。辩护小组组长律师**张思之**回忆说，审委会制定了《律师小组办案基本原则》的文件，要**辩护小组遵照执行**。那《基本原则》是，“**审这个案子最基本方针，叫做‘审罪不审错’**”，即审林、江等人的“罪”，不审毛、周等人的“错”。“**所谓的公开审判，名义上是公开审判，实际上是有组织的公开审判。旁听群众是有组织的，不是谁想来谁能来的。**”“**我们证人是经过培训的。**”“**总体上正式的彩排，两个庭各有一次。**”“**辩词 100%是律师起草，是经过上边要审、要定，这是事实，但并不是上面写的。**”显然，审委会所规定辩护规则和方针，是干涉辩护律师的权力；他们把律师的权力置于他们监管之下，把辩护变成舞台演出，并把演出叫做“**以法律为准绳**”。

“两案”审委会在审判前的幕后活动表明，“**两案**”开展审判的“**法律**”依据是：人大常委会的特别决定要服从中共中央书记处的决定；中共中央书记处的决定，要体现中共中央常委的领导；中共中央常委的领导，要遵照和执行常委新领导邓小平的指示。在“两案”

审委会的工作会议上，邓小平号令与会者说：“起诉书的内容不能涉及毛主席、周总理的错误，这一点要特别慎重。”在开审前的10月25日，邓小平别出心裁地给“拨乱反正”下定义，借以训示监察官和法官们。他说，“拨乱反正”就是“拨林彪、‘四人帮’破坏之乱，批评毛泽东同志晚年的错误，回到毛泽东思想的正确轨道上来。”由此可见，所谓“以法律为准绳”，实际上是以邓小平的号令和训示为准绳。这是人治的典型！

当“两案”审委会活动了三个多月后，1980年9月29日，第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根据中共中央的决定，再次举起“橡皮图章”，通过了《关于成立最高人民检察院特别检察厅和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检察、审判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主犯的决定》，并任命：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黄火青兼任特别检察厅厅长，喻屏、史进前为副厅长；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江华兼任特别法庭庭长，伍修权、曾汉周、黄玉昆为副庭长；曾汉周、伍修权分别为第一、第二审判庭审判长。到此，两个“最高”即最高人民检察院和最高人民法院，都拜倒在“**最高**”的审委会脚下，使“最高”变成了千古笑谈！

这就是“两案”审判“**以法律为准绳**”规则。这个规则表明，“**以法律为准绳**”的潜台词是“**以（最最高）邓小平的讲话为准绳**”，“两案”各个主犯的命运，已被党内权力敲定。“最高”两院检察官、法官们起诉和审判的表演，不过是“最最高”邓小平后台提线由“最高”在幕前蹦跳的木偶而已。由此可见，人们质疑审判的公正性、认定审判不是刑事审判而为政治审判，不是空穴来风，更不是无中生有。

再来看一看“最高”两院检察官、法官们在审判表演中，是如何“**以事实为根据**”的。

“最高”两院检察官、法官们，根据“最最高”邓的规定，在起诉书和判决书中，将“两案”主犯们的罪行，归纳为四大罪状四十八条罪行。

第一大罪状是：诬陷、迫害党和国家领导人，策划推翻无产阶级专政的政权。

在这项大罪状中，列举了23条罪行。其中：

诬陷、迫害国家主席、中共中央副主席刘少奇，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务院总理周恩来，中共中央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朱德，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总书记、国务院副总理邓小平；

诬陷、迫害党和国家领导、各中央局领导20人，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候补书记13人，国务院副总理12人，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5人，中共中央局第一书记4人；

在中共第八届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的193人中，分别被诬陷为“特务”、“叛徒”、“里通外国分子”、“反党分子”的有88人，（笔者计算：占全部委员的45.6%——下同）；

在中共八届中央监察委员60人中，有37人被诬陷为“叛徒”、“特务”或“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占全部委员的61.7%）；

在第三届人大常委115人中，被诬陷的有60人，（占常委的52.2%）；

在第四届全国政协常委委员159人中，被诬陷的有74人，（占常委的46.5%）；

在解放军中，被诬陷的高级干部84人，在“彻底砸烂总政阎王殿”中，4名正副主任和20名正副部长被诬陷，被迫害致死的高级将领达17人。

第二大罪状为：迫害、镇压广大干部和群众。

在第二项大罪状中，列举了 15 条罪行。其中：

刘仁、邓拓、吴晗、乐松生被迫害致死。上海市市委书记、市长、副市长和市委常委 17 人被分别诬陷为“叛、特、反”、“走资派”，市长曹荻秋和副市长金仲华被迫害致死。

制造了冀东冤案，使冀东地区党员干部、群众 8.4 万人遭受诬陷、迫害，2,955 人致死。

康生制造“赵健民特务案”，使云南大批干部、群众遭到诬陷、迫害，1.4 万人被迫害致死；

康生制造“内入党”冤案，有 34.6 万多名干部、群众遭到诬陷、迫害，1.62 万余人被迫害致死；

康生制造“新疆集团”冤案，使 92 名干部受迫害，马明芳等 26 人致死。

“东北帮”叛党投敌反革命集团 90 人冤案，张学思、贾陶、车向忱、陈先舟被迫害致死。

“广东地下党”冤案，使 7,100 多人遭到诬陷、迫害，林锵云等 85 人致死。

在解放军内制造大批冤案，使 8 万多人遭诬陷，1,169 人被迫害致死。

此外，各民主党派领导人被迫害致死 18 人；文艺界被诬陷、迫害的有 2,600 多人；教育界受诬陷、迫害的有 14.2 万多人；科学技术界遭到诬陷、迫害的有 5.3 万多人；卫生界仅卫生部直属高校的 674 名教授、副教授中，受诬陷、迫害就有 500 多人，有 6 人被迫害致死；归国华侨、侨眷被诬陷、迫害有 1.3 万多人，281 人被迫害致死。

第三大罪状为：谋害毛泽东主席，策动反革命武装政变。

这项罪状中，列举了六条罪行：其中：

制定“反革命武装政变计划”《“571 工程”纪要》；林彪下达了武装政变手令：“盼照立果、宇驰同志传达的命令办。”

第四大罪状为：策动上海武装叛乱。

在这一罪状中，列举了四条罪行。其中：

决定“要干”，调集了 3.35 万名民兵，动用各种枪炮 2.7 万余件，调集车辆 225 辆，集中大量物资和食品，组成了叛乱班子，并建立了两个秘密指挥点，制订了武装叛乱的作战方案。并提出“还我江青”、“还我春桥”、“还我文元”、“还我洪文”的反革命口号，要“决一死战”。

作为过来人，笔者对上述所列的四大罪状和四十八条罪行，除第三大罪状外，持基本肯定态度。因为，当年文革中的那些罪行，是司空见惯的现实，林、江两个集团成员，都是令人发指的打手、人人得而诛之的刽子手。但这些罪状和罪行，并不仅仅是林彪、江青两个集团成员犯下的，它是许多共产党人共同犯罪的结果，其中包括本次“最高”审判的组织者和那些在本案中列为被诬陷、迫害过的人。例如：

周恩来是个被诬陷、被迫害者，但他同时又是诬陷者、加害者。在文革初期，他紧跟毛泽东，同林彪和中央文革的江青、陈伯达、康生紧紧站在一起，“煽文化大革命之风，点火

化大革命之火”，支持、纵容红卫兵、造反派“横扫”、破“四旧”和夺权，枪杀了数十万计的无辜老百姓，包括他亲自下令枪杀无辜百姓刘文秀。在清查“五一六”和“一打三反”中，在他的直接领导下，又枪杀了数十万计的无辜老百姓，制造了大量冤假错案。做为专案组组长，他对刘少奇的迫害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在结案中，他竟发出了诛杀刘少奇的批示：“此人该杀！”历史记录无可争辩地证明，他同林、江两个集团成员一样，都是毛泽东的前台打手和刽子手。他之所以被邓小平的中共列为被诬陷、被迫害者，是因为在文革前五年，即“九一三事件”前，他曾利用权力暗中保护了一批右派当权派；文革后五年，他改弦更张，“立地成佛”，“解放”了大批右派当权派；接着，又为拯救中共与毛左势力展开角力，争取到了许多党心、军心和民心。

文革中，倍受诬陷、迫害的**刘少奇**，在文革初期，曾利用主持中央工作的权力，诬陷、迫害过一大批右派当权派和党内外知识分子。

在毛泽东死前最后被打倒的**邓小平**，第二次复出后，集党、政、军权于一身时，仅在1975年，就下令血洗沙甸村的所谓“反叛”，击毙、炸死回民1,600多人，镇压石河子民兵的所谓“兵变”，打死2,170人。

2、放过罪魁祸首毛泽东

无论是林、江两个集团的主犯，抑或是周、刘、邓等人，他们都不过是打手和刽子手而已，真正为首的主犯，是他们的司令——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

由于邓小平的中共，事前“替”两院做出了毛泽东犯的是“错”、不是“罪”的最高决定，使毛逃脱了是制造本案主要罪状和罪行首犯的指控。但历史却明明白白地记录了毛是本案诬陷、迫害、镇压和制造冤假错案的罪魁祸首，甚至第三大罪状的“策动反革命武装政变”，也是他逼出来的。请看历史的记录：

1、毛要分裂中共中央

为了权力，1964年他借酒发作说：“中央政治局、国务院、中央书记处都要排斥姓毛的。毛还是党的主席、军委主席，要逼我造反，我就造个天翻地乱！”

2、毛要搞“阶级斗争为纲”

在同外国人谈话中，他明言反对他的人“有中央委员、书记处书记，还有副总理。除此以外，每个部都有，每个省都有，支部书记里头更多。”他把反对他的右派，称为“官僚主义者阶级”。他警告右派，“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中资产阶级都将存在，并存在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危言“三分之一的政权不在我们手里”，因而他强调“阶级斗争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告诫全党全国“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这样，他为打倒右派、剥夺各级当权派、各种委员会委员权力的文化大革命，打下“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思想基础。

3、毛为发动文化大革命制造舆论

1966年，他把反对他的右派，如刘少奇、彭真等人，界定为“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他说：“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各种文化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是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一旦时机成熟，他们就会要夺取政权，由无产阶级专政变为资产阶级专政。这些人物，有些已被我们识破了，有些则还没有被识破，有些正在受到我们信用，被培养为我们的接班人，例如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他们现在睡在我们的身旁，各级党委必须充分注意这一点。”又说：“中宣部是阎王殿。要打倒阎王，解放小鬼。”又说：“彭真、北京

市委、中宣部要是再包庇坏人，中宣部要解散，北京市委要解散，五人小组要解散。”又说：“彭真是混到党内的渺小的人物，没有什么了不起，一个指头就捅倒他。”

4、毛主持通过了打倒中共“一大批”党组织的决定《十六条》

8月，八届十一中全会在毛主持下，通过了《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決定》(简称《十六条》)。《十六条》规定：“在当前，我们的目的是斗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批判资产阶级的反动学术‘权威’，批判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意识形态。”“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又说：“充分运用大字报、大辩论这些形式，进行大鸣大放……揭露一切牛鬼蛇神。”《十六条》把斗争的矛头指向中央委员、监察委员、人大常委委员和政协委员，指向各级当权派。据官方统计：在文化大革命的十年中，全国被立案审查的干部高达230万人，占文革前夕全国1,200万干部的19.2%；中央和国家机关各部委被审查的干部有29,885人，占干部总数的16.7%，其中，中央副部级和地方副省级以上的高级干部被立案审查的达75%；虽未正式立案审查，但被错误关押、批斗和株连的干部、群众，更是不计其数，仅被迫害致死的干部就有6万多人；集团性冤假错案，全国有近两万起，涉及干部、群众达几十万人。

5、毛要打倒不听话的文化界人物

他说：“高举无产阶级文化革命的大旗，彻底揭露那批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所谓‘学术权威’的资产阶级反动立场，彻底批判学术界、教育界、新闻界、文艺界、出版界的资产阶级反动思想，夺取在这些文化领域中的领导权。”1964年他在春节谈话中说：“要把唱戏的、写诗的、戏剧家、文学家赶出城，统统轰下乡，分期分批下放到农村、工厂……你下不去就不开饭，下去就开饭。”对于“三家村”，他说“我不相信，在文化革命中的问题只是吴晗问题，后面还有一串串‘三家村’。”

6、毛号召打倒一切

他利用他批准的讲话稿，由林彪、周恩来在天安门城楼上大喊大叫：

“我们要大破一切剥削阶级的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

“我们要扫除一切害人虫，搬掉一切绊脚石！”

“要把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把资产阶级右派分子，把资产阶级反动权威，彻底打倒，打垮使他们威风扫地，永世不得翻身！”

“我们要打倒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要打倒资产阶级反动权威，要打倒一切资产阶级保皇派，要反对形形色色的压制革命的行为，要打倒一切牛鬼蛇神！”

7、毛纵容、支持左派分子造反、闹事

1966年5月25日，北大哲学系总支部书记聂元梓等人，在北京大学贴出了一张矛头直指校党委和北京市委的大字报，要“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消灭一切牛鬼蛇神、一切赫鲁晓夫式的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这张杀气腾腾的大字报，被毛称为“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后又补充说：“聂元梓大字报是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中国的巴黎公社宣言书，意义超过巴黎公社。”

他下令学校从1966年6月13日起停课闹事。他说：“现在停课又管饭吃，吃了饭要发热，要闹事，不叫闹事干什么？”

8、毛支持红卫兵造反

1966年8月1日，他写信给清华大学附中红卫兵，向他们发出了“对反动派造反有理”的指令。对红卫兵乱批乱斗公然破坏法制的野蛮行径，“表示热烈的支持”，并保证说：“不论在北京，在全国，在文化大革命运动中，凡是同你们采取同样革命态度的人们，我们一律给予热烈的支持。”从18日起，到11月下旬，他先后在京8次接见了1,200多万红卫兵。他利用红卫兵的无知和野蛮，在全国到处鼓动“造反”，揪斗右派和各级当权派、委员，搞得官无宁日；任意揪、斗、批、杀无辜百姓，搞得民不聊生。对此，他美其名曰：“天下大

乱,达到天下大治。”

9、毛导演上海夺权的“一月风暴”

在他的怂恿、鼓励和操纵下,王洪文等造反派,夺取了中共上海市委、市政府权力,时称“一月风暴”。1967年元月8日,他对自己导演的夺权很满意,赞扬说:“这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这是一场大革命。”继而向全国发出了夺权的暗示:“上海革命力量起来,全国就有希望。它不能不影响整个华东,影响全国各省市。”他通过广播宣布:“我们坚决地支持你们敢闯、敢干、敢革命、敢造反的无产阶级革命精神!”

紧跟毛的周恩来说:“我们夺的是领导权,可以先夺权再逐步改造。”“政治统帅一切,要全面夺权”“外交部夺权我是支持的。”

10、毛号召、支持“横扫一切牛鬼蛇神”、大破“四旧”

在破“四旧”和“横扫一切牛鬼蛇神”中,他指令说:“北京几个朝代的遗老没人动过,这次‘破四旧’动了,这样也好。”

1966年6月,他发出了《关于发生打人事件的指示》:“对打人也要进行阶级分析:好人打坏人活该;坏人打好人,好人光荣;好人打好人误会。”可能发现说得太露骨了,便补充说:“今后不许打人,要摆事实,讲道理。”

1966年8月8日,由“毛泽东同志亲自主持制定的”的《十六条》的第一条规定:“资产阶级虽然已经被推翻,但是,他们企图用剥削阶级的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来腐蚀群众,征服人心,力求达到他们复辟的目的。”《十六条》还规定:“在当前,我们的目的是斗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批判资产阶级的反动学术‘权威’,批判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意识形态。”于是,林彪、周恩来利用毛批准的讲话稿,在天安门城楼上大喊大叫:“我们要大破一切剥削阶级的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我们要扫除一切害人虫,搬掉一切绊脚石!”

11、毛号召武斗、打内战

1966年8月23日,他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继续鼓吹“大乱”说:“主要问题是对各地所谓乱的问题,采取什么方针?我的意见是乱它几个月。”“我看北京乱得不厉害。”

12月26日,毛在他的73岁生日宴席上发出号召:“为展开全国全面内战干杯!”

在1967年4月军委扩大会上,他再次说:“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一场全面内战。”

7月13日,他在中央文革碰头会的全体成员会议上,鼓吹打死人。他说:“南京街上闹得很厉害,我越看越高兴。”“现在打死几个人,没有什么了不起。”

9月18日,他在长沙讲话:“打打也好,受教育嘛,许多农民不容易进城,现在是十五个工分,还有三十个工分,有的是抽人去打,有的是二元钱一天,有的是打一仗一百元钱,打死了给一百元钱,没打死也给一百元钱。”

1968年7月28日,他在召见首都红代会负责人谈话时,再次赞扬武斗。他说:“我才不怕打,一听打仗我就高兴。北京算什么打?无非冷兵器,开了几枪。四川才算打,双方都有几万人,有枪有炮,听说还有无线电。”

据报导,在毛号召的内战中,许多当权派遭到迫害,全国无辜百姓有50~60万人丧生。

12、毛号召“群众专政”,鼓吹有领导的无政府法西斯主义

1966年7月21日,毛说:“为什么不准包围省市委、报馆、国务院?”又说:“没有省委也不要紧,还有地委、县委呢!”

8月23日,毛在中央工作会议上说:“我的意见,乱它几个月。”

1967年9月18日,他说:“过去好像没有公检法就不得了了,我一听说公检法垮台了,我很高兴。”

“我看北京乱得不厉害。”他号召“群众专政”。1968年7月28日,他在肯定北京“群众专政”的经验时说:“过去北京革委会、卫成区对大学的武斗不怕乱、不管、不急、不压,

这看来还是对的。”

据报导，在毛的有领导的无政府主义法西斯式的“群众专政”中，全国约有 20 多万老百姓惨遭杀戮。

13、毛分裂军队、武装左派

1967 年 8 月 4 日，毛写信给江青说：“75%的军区和驻军支持右派。”因此，他在信中下达了“应大量武装左派”的命令。其中，被武装起来的上海左派民兵，成了“第四大罪状”的基础力量。

1967 年 7 月 18 日，他在东湖梅岭一号对周恩来、谢富治、王力等近臣说：“为什么不能把工人、学生武装起来？我看要把他们武装起来。”

1976 年 4 月 5 日，毛利用武装起来的左派基干民兵，镇压了天安门悼念周恩来的“四五运动”。

14、毛支持“揪军内一小撮”

1967 年 7 月 26 日，经毛泽东审定的中共中央《给武汉市革命群众和广大指战员的一封信》中明确提出：“你们英勇地打败了党内、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极端狂妄的进攻”。自此，“揪军内一小撮”的声浪席卷中国。例如“决心把混进党政军里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斗倒斗臭。”“坚决打倒中国的赫鲁晓夫，坚决打倒党内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坚决打倒武汉地区党内、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但到最后，他把责任推到“王关戚”即王力、关锋、戚本禹三个笔杆子身上。

15、毛支持江青的文革小组

1967 年 7 月 18 日，他说：“中央好多部，没有做多少好事，文革小组却做了不少好事，名声很大。”又说：“中央文革小组执行十一中全会精神，错误是百分之一二三，百分之九十七是正确的。谁反对中央文革小组，我就坚决反对谁！要否定文化大革命，办不到。”

16、毛下令清理阶级队伍

1968 年 6 月，毛对尼雷尔总统说：“解放以后十几年，被资产阶级包围，被国民党的残渣余孽和党内的叛徒、特务、反革命等坏人包围着。”“过去好多工厂、学校不在我们手里，很多在资产阶级手里，在国民党留下来的那些人手里……”清理阶级队伍运动，是文革中持续时间最长、受害面最宽的一次运动。《判决书》第二大罪状所列的冀东案、赵健民特务案、内人党案、新疆集团案、东北帮案、广东地下党案等冤案，包括本书列举的冤案，都是在毛下令“清队”中制造的。史学家丁抒在研究许多档案资料后，结论说：“清理阶级队伍运动三千万人被斗，五十万人死亡！”

17、毛逼走林彪

毛与副帅林彪发生矛盾，不依靠组织程序解决分歧，却利用南巡机会，发表非组织的南巡讲话，煽动下面倒林，终致林彪儿子林立果造反和携父母出逃。

18、毛批准周恩来提出的“一打三反”运动

在“一打三反”中，全国有数万异己者、持不同政见者和无辜老百姓，惨遭枪杀。

19、毛迫害刘少奇

1966 年 8 月的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毛怒斥刘少奇：“这是镇压，是恐怖，这个恐怖来自中央。”甚至斥刘是牛鬼蛇神：“牛鬼蛇神，在座的就有！”

8 月 5 日，毛写了一篇痛斥刘少奇的大字报《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和人民日报评论员的评论，写得何等好啊！请同志们重读这一篇大字报和这篇评论。可是在五十多天里，从中央到地方的某些领导同志，却反其道而行之，站在反动的资产阶级立场，实行资产阶级专政，将无产阶级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运动打下去，颠倒是非，混淆黑白，围剿革命派，压制不同意见，实行白色恐怖，自以为得意，长资产阶级的威风，灭无产阶级的志气，又何其毒也！联系一九六二年的右倾和一九六四

年的形“左”而实右的错误倾向，岂不是可以发人深醒的吗？”

在许多中央委员面前，毛训斥刘少奇说：“你有什么了不起，我动一个小指头，就可以把你打倒。”

当接到刘少奇死亡报告后，毛在报告上批道：“自作孽，不得活！”

据报导，全国因株连刘案或为刘鸣不平而被逮捕法办的有 28,000 多人，被批、斗、开除党籍和撤职下放的达十万人以上，为数不详的人致死、致伤、致残。

20、毛下令打倒邓小平

毛说：“清华大学出现的问题绝不是孤立的，是当前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斗争的反映。这是一股右倾翻案风。有些人总是对这次文化大革命不满意，总是要算文化大革命的帐，总是要翻案。”由是，“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在全国开展起来。

以上二十项历史纪录可以看出，做为文化大革命发动者和领导者的毛泽东，是个迫害狂，是个制造红色恐怖的罪魁祸首。基于邓小平和审委会的决定，“以事实为根据”为审判原则的“两高”，便以邓小平和审委会的决定为根据，有意袒护做为首犯毛泽东那些不争罪行，并将四大罪状中的**第一、二、四大罪状**，统统算到毛的打手、刽子手的身上，还着意隐瞒了曾做为打手、刽子手周、刘、邓的不光彩历史纪录。显然，这种袒护和隐瞒是包庇，是“两高”执法犯法的表现。对于第三大罪状，“两高”又将林立果、周宇驰、于新野、李伟信等少壮派军人反抗暴政、策划武装起义、决心用武力推翻毛泽东反动统治的造反行动，都算在没有造反意图、更无任何造反行动的林彪和“四大金刚”黄、吴、李、邱头上，不仅缺乏证据，而且还有罗织和栽赃之嫌。“两高”的意图是明确的：通过审判，为邓小平蓄意制造的新冤案，披上件“合法”的外衣。

“两高”的监察官法官们，为什么对毛泽东的罪行视而不见呢？为什么对江青答辩中说“我就是毛主席的一条狗”也不予采信呢？众所周知，中共审判“以事实为根据”的潜规则是“以邓小平的讲话为根据”！“两高”的监察官法官们，怎敢违拗这些潜规则呢？

3、保护毛泽东，拯救共产党

那么，邓小平为什么也对毛泽东的罪行视而不见呢？在文革中做为第二号最大走资派被毛打倒的邓小平，他对毛的罪行应该是很清楚的。他所倡导的“拨乱反正”、“平反冤假错案”和“改革开放”，实际上是对毛泽东罪行的批判。事实上，在高层中，他听到过许多反毛的声音。例如，曾为中共党副主席的陈云，对邓说：“（毛泽东）**第四阶段从 1966 年到他逝世为止，那惨绝人寰的‘文革’悲剧，他是主要责任者，应予全面否定。**”又说：“（毛泽东）**建党他有份，建国他有功，治国他无能，文革他有罪！**”——这是他既愿意听又不愿让更多人听到的声音。在审判中，江青激昂慷慨的答辩，使他无言以对：“你们究竟还承认不承认九大和十大通过的政治报告和党中央的一系列的重要文件和毛主席同志、周恩来同志的讲话和批示？”又说：“我所干的这一切，邓小平、华国锋，包括你们现在在台上的绝大多数人都曾经异口同声地拥护过，参加过，你们又怎样解释你们当年的行为呢？”——这是他既不愿意听又不得不听的声音。

但邓小平拒绝了一切与他主意相左的声音。他的主意就是“**拨林彪、‘四人帮’破坏之乱，批评毛泽东同志晚年的错误，回到毛泽东思想的正确轨道上来。**”也就是说，文革浩劫，是毛的晚年错误被林彪，江青罪犯集团利用所造成。这是这次两个“最高”审判谎言的原始标本。显然，他的主意不仅仅是出于感激毛不杀之恩，而是为了拯救中国共产党。

聪明的邓小平和他的幕僚们，吸取了苏联批判斯大林个人崇拜的教训：赫鲁晓夫的那场批判，不仅埋葬了苏联共产党，也必将埋葬整个世界共产主义运动。如果审判毛泽东，不仅会挖出毛泽东的谎言、野蛮和邪恶的反人类罪行历史，也会挖出他们自己曾与毛泽东共同犯罪的事实；这种等于审判共产党的审判，不仅会危及共产党的生存，也会危及他们的既得利益和权力。因此，为了拯救中国共产党，也拯救他们自己，他们必须保卫毛泽东这面红旗：必须掩盖“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由毛泽东亲自发动和领导的”铁定事实，把毛泽东罪恶滔天的“危害人类罪”（Crimes Against Humanity），缩小成“错误”，让毛解脱于制造浩劫之外；然后，再将其“错误”还原成罪恶，统统扣到林、江两个集团的头上，使其承担制造、领导浩劫的全部罪责。于是，在大规模平反冤假错案后，一大群罪有应得替罪羊，又被他们大张旗鼓地制造了出来。坚持马列毛主义的中共，其了不起之处在于：在无产阶级专政或叫做人民民主专政亦即一党独裁的条件下，他们能够在众目睽睽之下，把黑说成白，把白说成黑，而且说得理直气壮，毫不红脸！

由此可见，在这次大审判中，中共标榜的所谓“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公正”审判，是一个彻头彻尾彻里彻外的弥天大谎。

最可悲的是，大多数身处社会最底层的老百姓，在“两高”审判的愚弄下，在“舆论一律”的洗脑下，都变成了黑白不分、是非不清的芸芸群氓！

05-文革前民主、赤化革命简史

作者 于松然

“打天下，坐天下。”似乎成了中国民众心目中一个颠扑不破的“公理”。可是，到了“坐天下，传天下”时，特别是“坐天下”者忘乎所以，或传到不屑子孙时，民众就会对“公理”提出异意，甚至抗争，新一轮的“打”便被提到台面上来。著名学者黄炎培老先生，看到这种周而复始的怪圈，1945年7月初的一天下午，在延安杨家岭的一个窑洞里，不无感慨地对毛泽东说：“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毛泽东答道：“**我们已经找到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能不敢松懈。人民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这就是常被人们提到的“窑中对”（1）。

清朝末年，官员贪脏，政府腐败，列强侵略，割地赔款，国库空乏，百业凋零，民不聊生，怨声载道。腐败的清廷在内外交困中挣扎，被弄得焦头烂额，无以对应；中国国势衰微，遂被列强蔑视为“东亚病夫”和“泥塑巨人”，常遭其干涉和凌辱。

中国何去何从？

康有为、梁启超说要学日本的明治维新，即实行类似英国的君主立宪制。可是，清廷慈禧老佛爷闻听大怒：我爱新觉罗氏的大清天下，岂容你汉奴分享？她在北京菜市口，举刀砍了谭嗣同等“戊戌六君子”的人头（图注 01：变法殉难者谭嗣同），便给康梁的百日维新

——戊戌变法送了终。

孙中山见康梁变法失败，便提出了“**驱除鞑虏，建立民国**”的革命口号，以推翻满清政府为目标。他先后考察了欧美先进国家的自由和民主，创立了三民主义（图注 02：辛亥革命和孙中山），提出了从军政、训政最后到宪政的民主治国理念。1911年10月10日，武昌一声炮响，把统治中国近300年的清廷扫进了历史。辛亥革命看似成功了，可是，孙中山临终留下遗嘱却说：“**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民国初年，拥兵自重的军阀们，诸如张作霖、吴佩孚、冯玉祥等大小军阀，纷纷割据一方，称王称霸，连年混战，使蒋介石的国民党中央政府处于虚弱境地。领导八年抗战的国民党政府，虽然与同盟国并肩作战，取得了抗日战争的胜利，但内战中却败在共产党手下，被迫偏安于台湾，孙中山的三民主义，也因而才得以存活至今。

1919年5月4日，北京发生了反对北洋军阀政府的著名的“五四运动”（图注 03：五四运动）。在运动中，先进知识分子们，打起了“德先生”（民主）和“赛先生”（科学）的两面旗帜，纷纷向中国民众传播只有民主和科学才能救中国的道理。三民主义被注入了自由主义的新血液，备受军阀混战煎熬和列强欺凌的中国人，又看到了希望。然而，不分青红皂白地“打倒孔家店”，连中华民族优秀文化传统“仁义礼智信”，也当成糟粕扬弃了，错过了中外优秀文明融合的机会。例如：作家鲁迅在他的《狂人日记》里，把“仁义道德”斥为“吃人”的恶魔，令人遗憾。马列主义借机传入，扭曲了三民主义的希望。

毛泽东说，十月革命的炮声给中国送来了**马列主义**。这话没错。准确地说，马克思主义是经俄国转口传入中国的德国和英国货，而列宁主义则是正儿八经的俄国产品。马列主义的传入，使外来挑动仇恨的权力拜物教文化与中国封建专制文化混合在一起，熏陶了中国共产党人，从而使他们开始了以颠覆华夏文明、推翻以孙文思想和“五四”精神为代表的自由、民主、人权的普世价值为目的的暴力文化革命——赤化革命。**这种赤化革命，在1949年10月1日前，表现为武装夺权，在“新中国”成立以后，表现为掠夺和镇压！**

马克思主义在他的产地欧洲，以及世界其他地方，都没有多大市场。马克思主义所描述的共产主义社会，是一幅轻视自由、反对私有制、掠夺私人财产的乌托邦社会的美丽风景画。这个马克思主义传入俄国后，被握有生杀大权的弗·伊·列宁把“**党领导一切**”等蔑视自由、民主、人权的丛林法则注入**列宁主义**之后，这个“在欧洲游荡”的“共产主义怪影”，就变成了魔影：在极权主义面前，身价倍增，变成了横行二十世纪的权力拜物教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这种以武力为后盾的马列主义，它的灵魂，就是共产党一党独断下的暴力专政，即无产阶级专政。到了斯大林时代，这种崇拜权力的马列主义，很快变成了嗜血的**魔鬼**，即变成了镇压人类自由天性的**斯大林主义**：用阶级斗争学说，肆意践踏自由、民主和人权文明；用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社会主义学说，掠夺人民财富，破坏先进生产力，挥霍人类物资文明。在中国，自称为斯大林学生的毛泽东，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把列宁主义和斯大林主义推上了峰巅。这种共产主义者独有的赤文化或曰红祸文化，已被近百年世界共产党党史所验证。

1927年，中国共产党人，乘国内军阀混战、国民党党内派系林立和相互恶斗、中央统治权力严重削弱之时，借苏俄党魁斯大林支持之势，乘虚而入，揭竿而起。在苏俄的直接领导和数十万计的卢布（还有大量金卢布）援助下，中共在湘赣边界的罗霄山脉，实施**红色武装割据**，建立了根据地，尔后又成立了由苏俄直接领导的瑞金中华苏维埃政府（图注 04：瑞

金苏维埃政府），与虚弱的中央政府分庭抗礼。“老大哥”和“一边倒”的情结由此而生。国内年轻朋友们可能不相信，将来总有一天，那些“绝密”档案被迫解密时，会叫你恍然大悟：中共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除毛泽东等 12 名中国人外，怎么还有列宁派来的叫**马林**和**尼克尔斯基**的两个俄国人在指手划脚？在湘赣根据地领导核心的三巨头里，除周恩来、王稼祥外，怎么还有个名叫**李德**的由俄魁斯大林派来的德国人在指挥一切？

芦沟桥事变拯救了中国共产党。

国民政府军在强敌面前，浴血奋战，顽强抵抗，损兵折将达 320 多万，其中阵亡将士 150 多万，师以上将领 200 多人，最后才获得了元气大伤的惨胜（图注 05：抗日战争）。与此同时，中共在高呼全面抗战、大骂汪精卫卖国、狠揭蒋介石消极抗战的同时，暗中与日、汪勾结，分享情报，共同对付国民党。例如，日本特务头子**岩井英一**治下的“岩井公馆”及其外围组织“兴亚建国运动”、“上海编译社”、“自强学院”和《新中国报》等，都是中共与日、汪相互勾结的情报组织。岩井利用国共矛盾，把情报组织交给了中共党员**袁殊**、**恽逸群**、**翁从六**、**叶文津**和**刘人寿**等人去领导，用以搜集国民党的情报。抗日胜利后，袁、恽、翁、叶、刘等汉奸，逃脱了国民党的追捕，跑到了解放区。“解放”后，袁殊被任命为中共华中联络部第一工委主任、中央军委联络部副处长、中央情报总署亚洲司司长等要职。在暗中与日、汪勾结的同时，其军队则秘而不宣地采取“保存实力”、“积极发展”和“坐山观虎斗”亦即“一分抗日，二分应付，七分发展”的战略和游而不击、打了就跑的战术。1937 年 9 月，毛泽东向开赴山西作战的八路军第 115 师独立团团团长杨成武发出指示说：“**中日之战是本党发展的绝好机会，我们决定的政策是百分之七十是发展自己，百分之二十为妥协，百分之十对日作战。**”在党的利益高于一切的毛泽东思想指导下，中共抗日将领**彭德怀**发动的百团大战（图注 06：百团大战），被斥为“**帮助蒋介石抗日**”，受到了毛泽东等中共高层的激烈批判。到抗战末期，中共武装已从 3 万多发展成为 120 余万正规军和 200 多万民兵的强大军事力量，成了一支与国民党争天下的强大武装力量。国共内战时期，中共军队又获得了苏俄缴获后移交给他们的数十万件日本关东军的武器装备，实力大增，经四年内战（图注 07：国共内战），击败国民党政府军，夺得了政权，成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1964 年 7 月 10 日，毛泽东在接见日本社会党佐佐木更三等人谈话时，动情地说：“**我曾经跟日本朋友谈过。他们说，很对不起，日本皇军侵略了中国。我说：不，没有你们皇军侵略大半个中国，中国人民就不能团结起来对付你们，中国共产党就夺取不了政权！**”毛泽东在会见日本首相田中时，感激之情溢于言表，赞美侵略者说：“**皇军有功！**”从中共党的利益上去考量，毛泽东这种卖国式的战略战术，无疑是成功的。

马列主义的无产阶级专政理论和实践，树立了共产党绝对权威。

毛泽东的“新中国”成立以后，大权在握的他，痞性发作，推翻了他自己提出的“新民主主义”即民主治国理念，“一边倒”在苏俄独裁者斯大林的旗下，全盘接受了“老大哥”的**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无产阶级专政理论**，即崇尚丛林法则的斯大林主义，全面展开了以“反对帝国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封建主义”为口号的**赤化革命**。这个赤化革命，是打着均富的旗号、以**打击和清除**以儒释道为代表的中国传统文化与自由、民主、人权普世文化相结合的**现代文明**为目的的。这种赤化革命，为毛泽东发动和领导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创造了必要条件，做了必要准备。

在中国，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著作，可谓车载斗量，读不胜读；但其核心不外是阶级斗

争和社会主义：前者为政治手段，后者是经济手段，两者为同一个目的服务——**攫取和巩固共产党一党独大的权力**。阶级斗争说白了，就是分而治之的仇恨哲学，就是要你善于寻找、树立和制造 5% 的阶级敌人，调动一切手段去妖魔化这些敌人，借以恐吓、“教育”从而达到动员 95% “人民” 将敌人打倒之目的；社会主义说白了，就是官僚特权阶级的欺蒙哲学，就是以平等、均富等美丽词藻描绘出来的一个共产主义乌托邦画饼，并从“理论”上把这种画饼打扮成“不可抗拒的客观规律”，是“历史的必然”，借以达到欺蒙民心、拥护共产党之目的。对中共权贵们来说，两者的目的都是为了达到最终目的的手段，缺一不可。**这个最终目的是：**各级官僚特权阶级披着“无产阶级”或“人民”的外衣，以国家的名义，掠夺和占有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各个领域内的全部资源，即掠夺、占有土地、矿山、工业、农业、手工业、科学、文化艺术、文教卫事业和全部国家权力机构，使毛泽东和他领导下的中国共产党，变成名符其实的全国唯一的**雇主**，而各级官僚特权阶级则变成雇主的各级代理和**权贵**。在雇主和各级权贵的驱使下，广大老百姓则变成名符其实的**无产者和奴仆**，其生、老、病、死、衣、食、住、行、以及从事工、农、商、学、文等人类的基本权利，都不得不仰乞于雇主即“大救星”、“党妈妈”和各级权贵的“恩赐”，稍有违拗和反抗，便会遭到雇主和权贵们的歧视、处罚和镇压。这种对政治、经济、科学、文化、生活等国家全部资源、财富、权力的高度集中和垄断，就是与法西斯主义(2)异曲同工的**共产赤文化**。这种赤文化，是颠覆真、善、美华夏文明的专政文化，亦是践踏自由、民主、人权的普世文明的独裁文化，因而是马列主义、斯大林主义与毛泽东思想相结合的**马列毛主义**，或曰**马列加秦始皇主义**。二十世纪特别是五十年代以后，中国人历经的种种魔难，皆源于此。然而，时至今日，中共权贵和御用精英们投入大量人力财力，进行马列主义再塑造，力图淡化无产阶级专政的法西斯性，为构建所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理论而忙碌，浪费了大量资源，青、少年学生都必须为这种荒诞理论背书，付出青春代价！

不论中共**雇主**、权贵和御用精英们怎样连篇累牍地去论证社会主义，说他如何科学，如何合理、平等、均富，如何势所必然，世界共产主义运动历史包括已经消亡的前苏联、东欧八国和存活到今天中国、古巴、越南、朝鲜等国的历史，已经证明并将继续证明：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已经形成官僚特权阶级的**雇主**、权贵们，在高唱社会主义赞歌的同时，以无产阶级“革命和不断革命论”的理论为根据，即以革命名义剥夺个人财产，以国家名义去任意调动、支配国家和集体资源，甚至把“**不劳动不得食**”变成为“**不服从不得食**”；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阶级斗争成了“**与人斗其乐无穷**”的法宝，任何政见分歧，任何有悖于“**舆论一律**”、“**主旋律**”的社会科学和文学艺术，都会被**雇主**、权贵们“上纲上线”，视为反党、反社会主义、颠覆和制造动乱等“罪行”，从而“名正言顺”地将当事人逮捕并科以重刑。

毛泽东在论述无产阶级专政时说：“**政权就是镇压之权。**”又说：“**专政是群众的专政。**”前者是以枪杆子来保障无产阶级专政，后者则是以“**群众运动**”来实施无产阶级专政。

毛泽东和他领导下的中共，都是搞“**群众运动**”的行家里手。所谓“群众运动”，或曰“**群众专政**”，就是在枪杆子的弹压下，动员、唆使痞子、流氓无产者和芸芸勇敢者，逾越道德、法律和人权，采取非常手段，制造出一种在一定时段里的有领导的无政府法西斯氛围，形成对“阶级敌人”人人喊打的高压态势，恐吓、威迫全体老百姓，都能“自觉”地统一在党的意志下，从而达到预设的政治目的。因此，毛的“群众运动”实质上是中共党和政府领导下的痞子、流氓无产者的法西斯专政，亦即无产阶级专政。历史记录了“群众运动”操作过程中所创造的“**毛氏规律**”：

开始——确定**运动的革命目标**（对象），调动所有媒体采编人员，组写文章，放送广播，以制造舆论；各级党政军和企、事业单位领导，分别召开动员大会作报告，以妖魔化敌人的手段，造成“怀疑一切，打倒一切”肃杀氛围和“你死我活”的恐怖情势。

继而——成立3或5人“领导小组”领导**运动**；命令人人检查、个个“过关”，鼓动大胆怀疑，大胆揭发，以排查、筛查的方式挖出“阶级敌人”。

接着——定任务，分指标，确定**运动重点对象**（一般占单位人数的3~5%）；成立“专案组”，对重点对象内查外调；训练积极分子（多数是勇敢分子和痞子、流氓无产者），对重点对象进行批、斗、打、抄、杀等刑讯逼供；召开宽严大会，以体现“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的政策。

后期——总结**运动“胜利成果”**，对新制造出来的“阶级敌人”实行专政；对批斗刑讯错了的重点对象，“落实政策”，宣布“解放”，以示党的“宽大”，舒缓矛盾。

在实际操作中，四个阶段没有严格界线。在诸如镇反、土改、“横扫”、破“四旧”、夺权武斗等特殊时期，处决“阶级敌人”则授权基层党组织或“群众组织”，直接捕、审、决。

毛泽东的天才还在于，为了把“群众运动”的规模和烈度，控制在他认可的范围内，每次运动他都要向各级党组织下达完成任务的“**指标**”。

“**指标**”是统计学概念，属经济学范畴，毛泽东拿过来做政治化处理。把经济学上的概念发展成政治概念，不失为毛泽东的创造。上世纪五十年代的历史，记录了毛的这些创造：

在镇反运动中，他下令给上海的领导人：“**我认为1951年内至少应当杀掉罪大的匪首、惯匪、恶霸、特务及会门头子3,000人左右。而在上半年至少应杀掉1,500人左右。**”

在土改运动中，他对广东省委书记陶铸、赵紫阳等人“**村村见血**”和“**每村都要至少枪杀一个地主**”的红色恐怖，大加赞赏。

在农业合作化运动中，他明确规定：“**反革命五年抓一百五十万，每年三十万。**”等等。

一反公投、二拒普选、三恶民调的毛泽东，这些政治“**指标**”是怎么被他“**创造**”出来的？说书人有一句套话，叫“**一拍脑袋，计上心来**”。显然，他的“**指标**”是拍脑袋“**拍**”出来的。但善于造神的御用精英们并不认同；他们著文说，这是毛泽东倡导调查研究的结果。

不错，毛泽东曾说过这样一句话：“**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但这是一句真假掺和的谎言。因为，御用精英们未必不知道，在大多数情况下，中共的调查研究服从于毛对政治形势的评估和决策。例如，当毛泽东决心要农业学走苏联集体农庄道路时，“**绝大多数贫下中农坚决走互助合作道路**”的民情，便被各级党组织或御用精英们“**调查**”了出来；当毛泽东决心开展“四清”运动以转移饿死人的仇恨时，农村20%甚至30%的政权“**不在我们手里**”的敌情，便被各级党组织或御用精英们“**调查**”了出来，等等。到了六十年代，量化指标又有了新的创造和发展。1961年1月，毛泽东在“七千人大会”上说：“**我们站在那一边？站在占全人口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人民群众一边，还是站在占全人口百分之四、五的地、富、反、坏、右一边呢？必须站在人民群众这一边，绝不能站到人民敌人那一边去。**”1964年5月16日，毛泽东在北京举行的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上说：“**要团结广大群众，团结广大干部，团结这两个百分之九十五。**”于是，以毛的两次讲话为蓝本，“**群众运动**”中的四个量化指标又被中共和御用精英们“**拍**”了出来：拥护他们的“**人民**”占95%，反对他们的“**敌人**”

占 5%，可以“团结的群众”占 95%，可以“团结的干部”也占 95%。由是，团结、教育 95% 以上的“人民”和打击 5% 以内的“敌人”，便成了历次“群众运动”硬性指标。

尽管毛泽东的中共在夺取政权后，也制订了许多法律、法规，但他们更崇尚以丛林法则为思想基础的“群众运动”，并把“群众运动”作为他们实行无产阶级专政的主要手段。据《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建设四十年》一书记载，1958 年 8 月，毛泽东在国家协作区主任会议上说：“我们的规章制度，大多数，百分之九十是司局长搞的，我们基本上不靠那些，主要靠决议、开会，一年搞四次，不靠民法、刑法来维持秩序。人民代表大会，国务院开会，有他们那一套，我们还是靠我们那一套。”毛所说的“靠我们那一套”，主要指他的“群众运动”。由此可见，1954 年毛亲自领导下制定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包括其中规定人民群众享有的各种自由、民主权利，都是哄骗中国老百姓和外国人并不打算实行的官样文章。这种背信弃义的权力拜物教文化，是中共赤文化的重要特色之一。

夺取政权即所谓“建国”或“解放”后，毛泽东的中共，用蔑视自由、民主、人权的无产阶级专政理论，通过一个接一个的违宪犯法的“群众运动”，先后树立了成百万上千万个地（主）、富（农）、反（革命）、坏（分子）、右（派）、叛徒、内奸、走资派、黑帮、牛鬼蛇神、修正主义和反革命知识分子等阶级敌人，并用专政工具对其进行无情镇压。

1950 年，中共在全国农村全面开展的暴力土改运动（图注 08：土地改革运动），残杀了数以百万计的地主、富农，实现了对老百姓主要是对农民的第一次掠夺。掠夺颠覆了使中华民族数千年凝聚在一起的“仁义礼智信”的传统道德，摧毁了农村数千年和谐依存的宗法关系，扼杀了中国人勤劳和智慧，使农村中占多数的贫下中农，在对中共感恩戴德的同时，逐渐变成了一无所有的赤裸裸的现代农奴，并为此付出了惨重代价，从而使中共达到了分而治之的目的。

1950 年 10 月，在干涉他国内政的“全世界无产阶级联合起来”口号下，毛泽东和中共把党的利益、把“一边倒”的政策和“国际主义”义务置于国家利益之上，根据斯大林的指示，发动了“新中国”第一次大规模的对外战争——抗美援朝（图注 09：抗美援朝战争），自觉地中了斯大林消耗美国和控制中国的一箭双雕之计。他们以五六十万中华英雄儿女的生命和数十亿美元以及被孤立二十多年的巨大代价出兵朝鲜，愚蠢而不光彩地充当了导师的打手和炮灰，为霸主苏俄帝国主义立下了赫赫战功，保卫了金日成父子独裁的家天下。尽管抗美援朝战争使国家失去了美苏争霸中的渔人之利，但中共和毛泽东却借势强化了对异己势力的监控和镇压，巩固了他们的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政权。

1951 年的镇反运动（图注 10：镇压反革命运动），毛泽东的中共杀害了 100 多万包括起义、投诚和被俘人员在内的所谓“国民党残渣余孽”，达到了镇压异己和强化共产党权威的目的，使中华民族“宽以待人”的理念，化为烟云。

1955 年，批运动（图注 11：反胡风反革命集团运动），毛泽东和中共把胡的文艺思想妖魔化为“凶恶残暴的敌人”，制造了又一起文字冤狱，第一次用“思想罪”来警告知识分子，不得与共产党思想相左。

接着，在7月，毛泽东和中共开始的肃反运动，对知识分子的个人历史和隐私进行了全面清剿（[图注 12: 肃反运动](#)），使数以万计的人不堪凌辱而自杀。

在1957年的反右运动（[图注 13: 反右运动](#)）中，毛泽东的中共把100多万知识分子（约占全国知识分子的六分之一）打成了右派、档案右派和阶级异己分子，酿造成万马齐喑、一党独断的政治局面。

毛泽东和中共从1953年下半年开始的“一化三改造”运动中（[图注 14: 社会主义三大改造运动](#)），数年间，先后又划出了数十万计的地、富、反、坏等阶级敌人（中共诡称“土改漏划”），供人批斗；在批斗中，强制推行农业合作化和人民公社化，强迫实行小手工业集体化和工商业国家化；在枪杀、自杀20~30万人的基础上，使中共垄断了全国大小一切资源，成为名符其实的唯一**雇主**，实现了对中国农民的第二次掠夺，从而实现了对全体中国人民的全面掠夺。掠夺为**官僚特权阶级**的形成打下了基础，为权钱交易的腐败，创造了必要条件。

1958年，毛泽东的“大救星”权力情结发飙，突发异想，抛弃了社会主义经济规律思想，在中共大员们的支持下，搞了个异想天开的、超英赶美的、“流芳千古”的大跃进运动（[图注 15: 大跃进运动](#)）。运动中，他们强迫农民用毛的“**革命加拼命**”思想，进行超强劳动，结果弄得整个中国大陆饿殍遍野，怨声载道！

以“大救星”自居的毛泽东，权力情结已经使他不满足于数十万个小兵团农业合作社的小打小闹，他要大兵团作战，用大兵团掀起农业大跃进的新高潮。于是，在他筹划下，第一个“政社合一”的集“工农兵学商政”为一体的典型——嵯岬山卫星人民公社被制造了出来。1958年8月26日，他在河南新乡发出了“人民公社好”的号召后，到10月底，全国74万个集体所有制的高级农业社，变成了2.6万个全民即国家所有制的人民公社（[图注 16: 人民公社运动](#)），完成了从集体所有制向全民所有制的过渡，被誉为通向共产主义天堂的桥梁。然而，在而后的三年中，这个通向共产主义天堂桥梁的人民公社，为“新中国”制造了3,000~4,500万个饿殍！

毛泽东和中共不作反省，更不道歉，为了重树被“三面红旗”败坏了的共产党权威，抓住专政体制造就了的农村**官僚特权阶级**即基层干部中普遍存在的“四不清”等腐败问题，大做文章，并于1963年开始了整顿农村基层干部的“四清”运动（[图注 17: 四清运动](#)）。运动中，又使数百万农村基层干部和地、富、反、坏、右等五类分子遭到批斗，数万人惨遭杀害或自戕。本来对大跃进颇有微词的刘少奇，为了“紧跟”，成了四清运动直接领导者。

值得注意的是，中共和毛泽东所指的阶级敌人中，“地、富”是按生产资料占有形式划分的，“反、坏、右”是按某个时期政治斗争需要按思想、行为划分的，文革中又增加了许多名目的阶级敌人，其中，“叛徒、内奸、走资派”是党内政治斗争需要按人际关系或政治态度划分的，“黑帮、牛鬼蛇神，修正主义、反动权威、反革命知识分子”是党外政治斗争需要按思想、政治态度划分的。他们的这种机会主义的划分，是马列主义的异化：由所谓历史唯物主义蜕变为所谓历史唯心主义。这种异化，反映了**雇主**独霸的心态。更值得做省的是，制造和树立阶级敌人后，要丑化和妖魔化阶级敌人，并在批斗的同时，警示批斗者和广大老百姓，要信奉共产主义，要效忠毛泽东和共产党，从而达到惩一儆百的目的。

按照马列主义以生产资料占有状况**划分阶级**的理论，中国在 1956 年“一化三改造”完成后，阶级已不复存在，无产阶级专政的阶级基础也因而不复存在。但为什么无产阶级专政不但未被取消，反而越来越强化了呢？简单地说：他们反复向民众灌输“社会主义社会阶级斗争尖锐化”的说教，是既得利益个人和集团，为维护和巩固官僚特权阶级**既得权力——共产党绝对权威**的政治需要而采取的御人权术，是**雇主独霸**心态的表露，也是中国阴谋厚黑文化的张扬。可叹的是，除少数先知先觉和为虎作伥者外，大多数人都在为专制摇旗呐喊而浑然不知其愚！

无产阶级专政理论是丛林法则理论。毛泽东说：“口之于味，有嗜则同。”他呼应了“食色，性也”的动物法则。于是，人类固有的恻隐、宽容、仁爱和理智等中华文明体现的天理之心，被妖魔化，成了必须痛加批判的资产阶级思想；禽兽固有的仇杀、嗜血、冷酷和淡漠等邪恶痼疾，被神圣化，成了无产阶级思想加以弘扬。这是中共赤文化的另一重要特色！

在这个丛林赤文化条件下，信息被严密控制，导致整个社会形成了一种畸型的政治、道德氛围：

官本思想泛滥成灾，官僚特权阶级乔装打扮成人民的“勤务员”，在“为人民服务”的歌声中，横行乡里，鱼肉百姓；

由于官本思想的熏陶，多数人变得无条件地盲从“领导”，争相向“领导”显示自己的“积极”；

告密和出卖在“对党忠诚”的名义下横行，罗织罪名，打击同事，对朋友落井下石，出卖同事、朋友、同学乃至亲属，以换取“组织上”的信任；

政治高压使知识分子噤若寒蝉，没有人敢于发表与官方声音相左的言论；

封闭的社会文化环境，使下层民众变得蒙昧无知、逆来顺受甚至引颈就戮，等等。

显而易见，无产阶级专政的目的是：培植打手，塑造奴隶，占有全部精神、财富资源，用乌托邦宗教理论和物资平均主义，去掩盖官僚特权阶级的占有、剥削和镇压。于是，在这种丛林赤文化的长期鼓噪和洗脑下，便产生了一批又一批对独裁政权情有独钟的宠臣和御用精英，亦即**盲从拥戴者、争宠谄媚者、谎言制造者、告密出卖者、落井下石者和野蛮施暴者**，一大批在独裁者肆虐面前麻木不仁、愚昧而善良的民众，也应劫而生。

马列主义的无产阶级专政理论和实践，还制造了个人崇拜。

古今中外大理论家、大思想家，大都出于缺乏权力背景的专家、学者、教授之中，国外如柏拉图、亚理斯多德、黑格尔、费尔巴哈、康德等，中国如春秋时代的孔、孟、老、庄和二十世纪的胡适等，人们崇拜他们是**诚服于理**；唯独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大理论家、大思想家桂冠非握有生杀大权的无产阶级政治家莫属，人们崇拜他们是**慑服于权**。苏俄的列宁、斯大林，阿尔巴尼亚的霍查，北朝鲜的金日成金正日父子，中国的毛泽东、邓小平和“三个代表”的发明人江泽民等政治领袖们，都无例外地被誉为当代甚至空前的大理论家、大思想家。因此，全国人民崇拜他们、承认他们的绝对权威和绝对服从他们的个人意志，便“顺理成章”地成了不容置疑的律令。于是，生活糜烂、道德败坏、诡计多端的毛泽东，凭着他那几本马恩列斯的无产阶级专政理论与封建君王御人权术相混合的著作（其中不乏有他人捉笔的），亦即毛泽东思想，便被奴才精英们拥上了政治家、军事家、理论家、哲学家、历史学家、语言学家、文学家、诗人、物理学家、甚至道德楷模的宝座，推上了个人崇拜的峰巅。

文革中惨死在毛泽东手下的国家主席刘少奇，在 1945 年的延安，他第一个提出了“毛泽东思想”，在“七大”一次报告中，提到毛泽东名字达 105 次之多。他提高嗓门说：“**我们伟大领袖毛泽东已经用他的思想把我们全民族的思想提高到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这就是毛泽东思想！**”他力排众议，把“毛泽东思想”确立为中共的指导思想，从而为树立毛泽东的绝对权威铺平了道路。

文革中被毛泽东逼得仓皇促逃、几乎全家都摔死在异国他乡的中共党的唯一副主席、副统帅林彪，更把毛泽东的个人崇拜吹捧得天花乱坠，令人咋舌。一句“**毛泽东思想是当代马克思主义的顶峰，是最高最活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成了他的千古绝唱。

文革中差一点被打倒后又被拖死的总理周恩来，不仅在毛泽东面前低三下四，在毛的老婆江青面前，也是卑躬屈膝，当着众多学生高呼“**向江青同志学习**”，“**向江青同志致敬**”的口号，全然不知中国国家总理的尊严。

文革中遭到毛泽东残酷批斗、被扭断胳膊后侥幸死里逃生的北京市委书记、市长彭真，第一个在中国喊出了“毛主席万岁”的口号，甚至到了大祸临头的政治局会议上，他还以“**是谁第一个喊毛主席万岁**”的理由与对手们争辩，力争做最后一次向毛泽东谄媚和求饶的努力。

文革中惨遭批斗病死于合肥的原广东省委第一书记陶铸，文革初，曾荣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当过党和国家第四把手。他说：“**对主席就是要迷信。**”

上海市委第一书记、曾被毛内定为取代周恩来当国务院总理的柯庆施说：“**我们相信主席要相信到迷信的程度，服从主席要服从到盲从的地步！**”。

其他那些权贵们，诸如中共中央总书记邓小平、中共中央常委康生、陈伯达、张春桥，元帅朱德、陈毅、贺龙，等等，都是鼓吹毛泽东个人崇拜的能手，他们长期为争宠谄媚而不遗余力。无产阶级专政及其理论制造的崇拜和歌颂党的领袖，成了中共赤文化的又一重要特色。

马列主义的无产阶级专政所制造的个人崇拜，必然导致权力不受监督；而不受监督权力，必然导致无法遏制的暴虐和腐败。

从确立毛泽东的权威到确立毛泽东的绝对权威，有一个令人反思的历程。

1945 年，毛泽东借延安整风排斥和屠戮政敌的余威，运用权术，培植了诸如刘少奇、康生等一批争宠谄媚者，巩固了发号施令的权威地位。

为了控制中央，毛泽东利用矛盾，分而治之。五十年代初，他以“五马进京”的权谋，上调东北局第一书记、东北军政委员会主席**高岗**和华东局第一书记、军政委员会主席**饶漱石**来京，制衡刘少奇和周恩来的权力。但当高、饶遭到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邓小平、彭真等人联手强力反击时，他来了 180 度大转弯，将高、饶打倒（图注 18：高饶事件）。

1954年以“增强党的团结”名义，在独裁者宠臣和御用精英们的支持下，将高、饶开除出党，迫使高自杀，饶监毙，从而达到了控制全局的目的。

1959年在庐山会议上（图注 19：庐山会议），当国防部部长彭德怀对他鼓吹的行将造成严重后果的大跃进政策提出批评时，一句“浮夸风较普遍地滋长起来”和一句“小资产阶级的狂热性”，竟使毛泽东的尊严受到“羞辱”而勃然大怒。他明知彭德怀的批评是正确的，但他运用权术，利用彭德怀生性直率政敌较多的弱点，在独裁者宠臣和御用精英们的支持下，给彭德怀扣上了“反党集团”和“里通外国”等莫须有的罪名，当即罢了彭德怀的官，文革中又将其置于死地。

1960年前后，他的大跃进政策导致 3,000~4,500 万人饿死（据称，官方承认“非正常死亡” 3,767 万人），促成意见分歧，党内形成左、中、右派集团，处于分裂边缘。此时此地，毛泽东的权威地位，受到了刘少奇、邓小平为首的党内右派集团的严重挑战，在 1961 年的“七千人大会”上（图注 20：“七千人大会”），他被迫违心地做了“自我批评”。熟读经史、深谙厚黑权术的毛泽东，不甘心权威受挫，在利用掌管枪杆子的林彪大力培植对他个人崇拜的同时，大造“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保卫社会主义江山”和“重点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舆论，开始了反击刘、邓的部署。接着，在独裁者宠臣和御用精英们的支持下，对关键岗位上的人事做了调整。到 1966 年 5 月，他的绝对权威地位已经空前巩固，向刘少奇、邓小平兴师问罪的时机已经成熟，可以说是“万事俱备，只欠东风”了。

翻开真实的历史看看，毛泽东不择手段地打击党内不同政见者，同打击党外不同政见者一样，都是在独裁者宠臣和御用精英们前赴后继地积极赞同、参与、吹捧下完成的。

个人崇拜使毛泽东毫无阻拦地发动了文化大革命，那些在文革中先后死于非命的刘少奇、林彪们，那些被打倒的邓小平、彭真和“革命干部”们，那些“群众专政”中的痞子、流氓无产者和野蛮施暴者们，以及那些善良而愚昧的“革命群众”们，不是那场浩劫的帮凶，就是那场浩劫的推波助澜者。

在西方，“个人崇拜”（PERSONAL CULT）同“邪教”是一个同义词。

无产阶级专政（后改称人民民主专政）制造了个人崇拜，个人崇拜培植了愚昧、奴性和野蛮，从而巩固了无产阶级专政；专政与迷信在循环往复中，不断强化，但又不可避免地日趋衰亡。

六十多年前，中国当代先知先觉的思想家胡适之（图注 21：自由主义思想家胡适），以自由主义的人权价值观向马列主义和毛泽东的集权主义价值观挑战。他说：“你争取个人的自由，就是争取国家的自由。”又说：“一个真正的开明进步的国家，不是一群奴才造成的，是要有独立个性、有自由思考的人造成的。”又说：“无论是东风压了西风，还是西风压了东风，都是不容忍，都是摧残自由。”至今大多数中国人对此一无所知。但在中国，这种伟大思想曾被御用精英们贬斥为“汉奸”、“反动”言论，胡适本人则被骂做“流氓”、“骗子兼恶棍”。

在毛泽东时代，自由在呻吟，民主在挣扎，人权在煎熬，“窑中对”成了毛泽东戏弄中

国民众的权术！直到二十一世纪的今天，当自由、民主、人权的普世文化浩浩荡荡风靡全球时，中共雇主、权贵和御用精英们，继承毛泽东的衣钵，将普世价值视为洪水猛兽，称其为“美丽的谎言”，是“中国人民最危险的敌人”，他们还用“不搞多党轮流执政，不搞指导思想多元化，不搞‘三权鼎立’和两院制，不搞联邦制，不搞私有化”的“五不搞”⁽³⁾，将其拒于国门之外。现在，看起来他们十分强大，但他们的倒行逆施，终将被觉悟了的中国人扫进历史垃圾堆。

上述可见，马列主义的无产阶级专政理论和实践，成就了中国共产党，而中共的个人崇拜，又把毛泽东推上了独裁和谎言、野蛮、邪恶的峰巅。有朝一日，当历史挣脱权力打扮时，二十七年的历史记录，必将给毛泽东以恰如其分的人生定位：

权谋盖世，罪恶滔天！

中国人应该甦醒了！

附注 A:

附 1、“窑中对”

1945年7月4日，毛泽东问黄炎培来延安考察做何感想？答曰：“我生六十多年，耳闻的不说，亲眼所见的真可谓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一人、一家、一团体、乃至一国家，不少单位都没能跳出这周期律的支配力。初时聚精会神，无人不用心，不卖力。历时长久，惰性发作，到风气养成，虽大力无法扭转。且无法补救。”，“中共诸君，从过去到现在我略略了解，就是希望找出一条新路，跳出这周期律的支配”。

黄炎培的“周期律”，曾引起毛泽东忧虑和思考。进入北京后，毛泽东再邀黄炎培，深入研究“周期律”。毛泽东胸有成竹地说：“我们已经找到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律。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能不敢松懈。人民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

附 2、法西斯主义

法西斯主义是一种压制个人主义、鼓吹集体、民族和国家至上的政治哲学，是特定历史条件下形成的国际现象。对内，它反对民主主义、自由主义、崇尚暴力和蔑视人权，主张建立中央集权主义的独裁统治，由政府统管全国经济，对人民生活实行全面监控，镇压一切形式的反对者；对外，它鼓吹民族沙文主义、奉行重分世界的战争政策。

附 3、“五不搞”

2011年3月10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吴邦国，代表中共中央宣布：“从中国国情出发，郑重表明我们不搞多党轮流执政，不搞指导思想多元化，不搞‘三权鼎立’和两院制，不搞联邦制，不搞私有化。”

附注 B: 图注 1—21 (略)

图文注释 (简评文革前的历史事件) 目录:

图注 01: 变法殉难者谭嗣同	图注 12: 肃反运动
-----------------	-------------

图注 02: 辛亥革命和孙中山	图注 13: 反右运动
图注 03: “五四”运动	图注 14: 社会主义三大改造运动
图注 04: 瑞金苏维埃政府	图注 15: 大跃进运动
图注 05: 抗日战争	图注 16: 人民公社运动
图注 06: 百团大战	图注 17: “四清”运动
图注 07: 国共内战	图注 18: 高饶事件
图注 08: 土地改革运动	图注 19: 庐山会议批判彭德怀
图注 09: 抗美援朝战争	图注 20: “七千人大会”
图注 10: 镇压反革命运动	图注 21: 自由主义思想家胡适
图注 11: 镇压胡风集团运动	

06-文革概论

作者 于松然

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在中国大陆的和平环境里，发生了一场由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简称文革），或曰赤化大革命，痞子大革命。晚年的毛泽东，曾多次不无自豪地说，他这一生干了两件大事，一个是推翻国民党的“反动统治”，一个是发动文化大革命。然而，令他没有想到的是，他死后刚两年多一点，那场被他誉为“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的、“保证中国千秋万代永不变色”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被他的继任人——中共中央右派（1）领袖们，谴责为“十年动乱”和“浩劫”。他的那些左膀右臂们，那些为他冲锋陷阵且荼毒生灵的打手们，在他死后不到一个月，便被党内右派一网打尽，三年后又被送上最高法院的特别法庭受审，分别判处有期徒刑或无期徒刑，结束了他们长达十多年的自恃、骄横和至尊，成了刑期漫漫的阶下囚。

毛泽东说：“党内无派，千奇百怪。”这话不假。

六十年代初饿殍遍野大灾难过后，在中共党内，逐渐形成了以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为首、国防部部长林彪为副的左派集团和以国家主席刘少奇、中共中央总书记邓小平为首的右派集团，国务院总理周恩来则居中摇摆于两派之间。在国民经济遭到严重破坏和大量饿死农民——中共官方称“非正常死亡”3,767万人的残酷现实面前，党内右派有良知地、策略地承担了责任，他们在党内中摇派的支持和左派的默许下，采取了一些比较开明和有效的补救措施，如政治上广开言路的“神仙会”（2）和经济上的“三自一包”（3）等亡羊补牢措施，扭转了局面，当时颇得人心。在饿殍遍野面前的毛泽东呢？由于他鼓吹和顽固推行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的所谓“三面红旗”政策，威望遭到重创，权力受到了党内右派前所未有的挑战，被迫退居二线。但崇信枪杆子的毛泽东，不甘人下，他死死抓住掌管枪杆子的林彪、紧紧拉住党内中摇派，终于在1962年9月，打着“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中资产阶级都将

存在，并存在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的旗号，发出的“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呼叫，开始向党内右派发难。

制造舆论，以舆论为先导，这是毛泽东夺取权力的拿手谋略。从《新华社》编纂的《中国共产党大事记》等文件中可以看到，自1963年到1965年间，毛泽东曾多次批判“有人不搞阶级斗争”，说“三和一少”（4）是他们的国际纲领，“三自一包”是他们的国内纲领，“目的是要解散社会主义农业集体经济，要搞垮社会主义制度。”他指派他的夫人江青，借批判《“有鬼无害”论》、《海瑞罢官》等文章，大造舆论，推倒“神仙会”，无情地打击支持党内右派的知识分子，步步逼向党内右派。同时，他还纠集许多棍子打手，诸如姚文元、王力、戚本禹等，制造耸人听闻的白色恐怖谎言：不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修正主义分子就会上台，就会使中国人民重吃二遍苦，重受二茬罪，就会使千百万人头落地，等等。批判的噪音越放越大，防修反修的口号越呼越响，批判的火力越来越猛，火药味也越来越浓烈，全中国都被拖入“山雨欲来风满楼”的氛围中。事实已表明，在那时，文化大革命的号角已经吹响，打倒刘、邓为代表的党内右派集团的战旗已经竖起。到1966年5月，毛泽东依靠军队和舆论力量，剥夺了党内右派的中央领导权。但强大的党内右派势力并不甘心失败，他们忍辱负重，卧薪尝胆，等待时机，东山再起。毛泽东敏锐地察觉到右派反攻倒算的危险，下决心借助文化大革命运动，彻底打倒党内右派势力，消灭一切支持他们的社会基础。于是，他软硬兼施，迫使中共中央通过了进行文化大革命的《五一六通知》，从而使中国卷入了旷日持久地、一场接一场地、血腥地、大规模地批斗和屠杀中。

在这场反人类的血腥批斗、屠杀中，党内右派包括多数中间派，都付出了巨大代价，但最终他们却笑到了最后；不可一世的毛泽东为首的党内左派集团，在文革中横行霸道，但最终却遭到了沉重打击！

在那场浩劫中，上层权力搏斗，使中国老百姓付出了惨痛代价：两三百万人死于非命，伤残不计其数！历史记录了这场浩劫中的大批、大斗、大屠杀、大改组：

- 1965年 舆论准备——发表《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
- 1966年 批“彭罗陆杨”、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红卫兵破“四旧”——**文革第一轮大屠杀；**
- 1967年 夺权和反夺权、武斗与镇压、“群众专政”——**文革第二、三轮大屠杀；**
- 1968年 上山下乡、群众专政、清理阶级队伍——**文革第四、五轮大屠杀；**
- 1969年 斗、批、改，折磨死刘少奇；
- 1970年 清查“五一六”、“一打三反”——**文革第六轮大屠杀；**
- 1971年 批陈（伯达）整风、副统帅林彪出逃摔死；
- 1972~1973年 批林（彪）整风；
- 1974年 批林批孔批周公（恩来）；
- 1975年 再批周公、整顿、石河子镇压、沙甸惨案——**文革第七轮大屠杀；**
- 1976年 批邓（小平）、“四五”怒潮、毛死、宫廷政变；
- 1977年 “两个凡是”、邓小平复出，宣布结束文化大革命——**文革第八轮大屠杀；**
- 1978年 批“两个凡是”、小岗村农民“造反”；
- 1979~1981年 文革余波：平反、改革开放、审判闹剧。

那一场接着一场的大规模批斗和屠杀，触目惊心，令人不寒而栗，回忆起来，至今还心有余悸！（前事不忘，后事之师。**笔者紧急呼吁：**每年的5月16日，即中共在1966年通过

进行文化大革命的《五一六通知》的那一天，理应成为“中国文革大屠杀纪念日”，年年铭记，岁岁不忘！)

著名作家秦牧曾这样评述文化大革命：“这真是空前的一场浩劫，多少百万人颠连困顿，多少百万人含恨以终，多少家庭分崩离析，多少少年儿童变成了流氓恶棍，多少书籍被付之一炬，多少名胜古迹横遭破坏，多少先贤坟墓被挖掉，多少罪恶假革命之名以进行！”

据官方统计：在文化大革命的十年中，全国被立案审查的干部，高达 230 万人，占文革前夕全国 1,200 万干部的 19.2%；中央和国家机关各部委，被审查的干部有 29,885 人，占干部总数的 16.7%，其中，中央副部级和地方副省级以上的高级干部，被立案审查的达 75%；虽未正式立案审查但被错误关押、批斗和株连的干部、群众，更是不计其数，仅被迫害致死的干部就有 6 万多人；集团性冤假错案，全国有近两万起，涉及干部、群众达几十万人。连同其他的冤假错案，共有 300 多万件；文革十年间，直接遭到非法处理的就达几百万人。

在文革的“横扫”、破“四旧”、夺权、全面内战、上山下乡、“群众专政”、“清队”、“一打三反”、清查“五一六”、批林批孔、夷平沙甸等系列反人类运动中，造成了空前人权大灾难，使数以百万计的死难者，成为毛泽东夺取权力祭坛上的牺牲。死难者大部分被枪杀、打死或自杀，还有相当一部分备受折磨而死。在这些死难者中，上至国家主席，下到无辜平民百姓，甚至八九十多岁老人和刚满 10 天的婴儿（湖南道县），都不能幸免于难。

美国夏威夷大学 R·J·Rummel 教授的著作《一百年血淋淋的中国》中说，文革人权灾难中丧生者的数目大约为 773 万人。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等合编的《建国以来历史政治运动事实》披露了这样一组数字：“1984 年 5 月，中共中央又经过两年零七个月的全面调查、核实，重新统计的文革有关数字是：420 万余人被关押审查；172 万 8 千余人非正常死亡；13 万 5 千余人被以现行反革命罪判处死刑；武斗中死亡 23 万 7 千余人，703 万余人伤残；7 万 1 千 2 百余个家庭整个被毁。”中国多数学者认为，文革死难者约在 300 万以上，史学家丁抒则认为文革死难者不少于 200 万。北京理工大学胡星斗教授，在北大《燕南评论》上撰文《文革学研究》中说：“‘文化大革命’是一场浩劫。叶剑英说，‘文革’造成了 2,000 万人死亡。现在看来，死亡人数也许没有这么多，但无数的人遭受迫害、屠戮，是不争的事实。”笔者考据后认为：叶是那么说的；但可能年老口误，把“伤亡”说成“死亡”！

文革浩劫中究竟死了多少人？一九八〇年邓小平对意大利女记者法拉奇说：“永远也统计不了。……总之，人死了很多人。”看来，在文革资料死不解密、独立调查研究受阻、文革独立调查报告和回忆录遭查封、打压的环境里，文革死亡人数还会继续研究、考证和争论下去。

此外，在浩劫中受到诬陷、迫害和株连的人数，许多专家认为在亿万以上。显而易见，文化大革命就是用鲜血浇铸的赤化大革命，是对联合国《世界人权宣言》（5）的蔑视和颠覆！

两千多年前，秦始皇怒曰：“天子之怒，伏尸百万，流血千里。”两千多年后的毛泽东，因向刘、邓夺权，一怒之下，发动了文化大革命，终致伏尸 200~300 万，血流 960 万平方公里！

文革中的国民经济呢？邓小平和著名经济学家薛暮桥都说：“文革末期，国民经济已经到了崩溃的边缘。”

出于拯救中国共产党的考量，官方拒绝清算毛泽东的滔天大罪，对文革信息实行禁脔和封锁，力图使中国人在流逝的长河里，悄悄淡化、改变乃至最后洗刷掉文革的记忆。今日中国，五十岁以下的中年人，了解这段历史的已少之又少，五十岁以上的老者，许多人对文革历史，也正在悄悄淡化中忘却。改革开放后，由于中共拒绝清算毛泽东暨文革的谎言、野蛮和邪恶，导致一党专政下的腐败，由政治领域向经济领域扩展，从而使社会两极分化，官民对立，民怨沸腾。其时，那些毛泽东时代的受益者以及他们的遗老遗少们，不去清算文革，反而怀念毛泽东时代的“美好”，把鲜血淋漓的“横扫”、破“四旧”等红色恐怖，美化成“社会主义大民主”，竭力鼓噪毛泽东的“伟大、光荣、正确”，甚至扬言“再来一次文化大革命”。与此相呼应，党内以十七大政治局委员**薄熙来**为代表的文革余孽，正在摩拳擦掌，卷土重来。而在文革受难者中，竟然也出现了为文革招魂者。例如，中共十八大常委、现任政协主席的**俞正声**，据说文革中，他的母亲被逼疯，妹妹自杀，株连的亲友死了六七位，但在2011年6月20日下午，他给上海交大学生上党课时，竟推波助澜，说他自己“真真切切地感觉到”，毛当年发动文革的“动机是无可厚非的”。

人们会附和俞正声的“动机论”吗？

不能！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动机，绝非来自于他的理想主义，那个乌托邦是个美丽的借口，一个克敌制胜的策略；他的动机源于他的本能冲动，而这种本能冲动，源于他心底**权力拜物教**的权力情结。

所谓“权力拜物教”亦即对权生万物的权力崇拜，是马列主义的灵魂，而无产阶级专政理论则是马列主义的灵魂中枢，同君权神授理论一样，都是权力拜物教演绎的必然结果。如果说商品拜物教是资产阶级崇拜商品神力的商品情结，那么，权力拜物教则是共产党人迷信权力魔力的权力情结。这种权力情结，是欲望、贪婪、杀戮和恐惧的化身，是深藏于人类右脑中的潜意识，或称为“前意识”、“祖先脑”，亦是人类原始的、低级的、本能的需求，同雄狮竞霸、悍猴争王的丛林法则，没有本质区别。因此，马克思告诫共产党人，要充分运用包括武力在内的一切权力，打碎资产阶级国家机器，建立无产阶级专政。他说：“工人阶级不能简单地掌握现成的国家机器，并运用它来达到自己的目的。”列宁进而说：“政权在哪个阶级手里，这一点决定一切。”毛泽东则说：“革命的中心任务和最高形式是武装夺取政权。”林彪更直截了当地说：“有权就有一切。”凡此等等，一言蔽之，他们都崇拜权力，都对权生万物的“必然性”深信不疑，且走火入魔。列宁赞颂马克思说：“凡是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看到物与物之间的关系的**地方（商品交换商品），马克思都揭示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而在权力拜物教的毛泽东时代，亦即在中共用权力掠夺了国家全部资源的社会主义时代，人们看到的“物与物之间的关系”，实际上是已蜕变成官僚特权阶级的中共各级官僚以物资占有者的雇主身份赐予或分配给佣工赖以生存物资的关系。这种由权力占有全部资源后的“物与物之间的关系”，“都揭示了”毛泽东式“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亦即失掉物质资源的老百姓依附于“大救星”的关系，“党妈妈”“哺育”八亿“子民”的关系，甚至从“**不劳动者不得食**”发展到“**不服从者不得食**”的关系，一言盖之，就是雇主拥有对奴隶实行物资分配和生杀予夺权力的关系。例如，毛泽东在1965年春节谈话中，曾以雇主身份对文艺工作者发出过这样一条命令：“你不下去就不开饭，下去就开饭！”

与丛林法则不同的是，人类中的天才者毛泽东及其附庸，根据他们的恩师马、恩、列、斯的教导，能制造出许多“伟大、光荣、正确”的理想主义理论，把人类原始的、低级的、本能的权力需求，“论证”成公正的、均富的、科学的乌托邦共产主义，来颠覆人类社会区别于丛林兽行的普世价值和真、善、美的华夏文明，亦即用仇恨、杀戮的霸权来颠覆仁爱、宽容的人权，从而达到愚弄、折腾老百姓之目的。因此，就动机而论，如果说鼓吹大跃进是毛泽东以“大救星”自居的权力情结的疯狂，那么，发动文化大革命则是毛泽东要清除异己、屠戮持不同政见者和争当世界领袖的权力情结的暴虐。俞正声用“好心办了错事”亦即用理想主义来替毛泽东贪婪、嗜权成魔的邪恶开脱罪责，是徒劳的，历史也不会答应。因此，我们有责任反其道而行之：

**唤醒记忆！
拒绝遗忘！
力主反省！
敦促忏悔！**

今日中共党政领导，多是当时的党内右派或党内右派接班人，对于那场反人类浩劫的反省，大多都停留在党内右派官员们遭受不公正待遇上，而置数百万死难百姓于不顾。出于对中共历史形象和既得利益集团合法性的考虑，从而拯救中共，他们千方百计地粉饰毛泽东，把毛泽东的种种罪行都推到林彪、“四人帮”身上，把文革中的文件、文字、影像等资料，封锁于绝密的密室中，只有部分资料恩准少数御用专家据有。但封锁疏漏，有些异议者摆脱监控，使一些文革资料得以散落民间。

三十多年来，学者们虽然都从不同角度研究了那场灭绝人伦的浩劫，但由于资料和信息被严密控制，少数有档案资料的专家、学者，又听命于中宣部“主旋律”权力的安排，有意保护毛泽东，淡化甚至绕开“毛泽东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这一关键的决定性的事实，使得多数人的研究，不得不屈从于“毛泽东晚年错误被林彪‘四人帮’所利用”这一官方权威性的政治宣传框架之下，使林彪和“四人帮”，几乎全部承担了毛泽东的“错误”，从而使毛泽东对中国人民犯下的滔天罪行得不到应有的清算。这种**贬谪臣下、褒美君王**的保卫江山的封建传统，至今还主导着中国的政治、宣传、教育和文艺舞台。这是对历史的戏弄、玷污和犯罪！

清算毛泽东对中国人民犯下的滔天罪行，就要打破他对无产阶级的垄断。马列主义的无产阶级专政理论，是权力拜物教理论，说到底，是打着无产阶级旗号夺取和保卫权力的理论。到了1957年，“无产阶级”同“人民”合二而一，成了无产阶级专政的符号；而所谓的无产阶级专政，也成了强奸无产阶级和人民的符号。历史证明，不经投票，毛泽东的中共便自封为95%以上人民的代表，并赋予“人民”以新的内涵：“**在现阶段，在建设社会主义的时期，一切赞成、拥护和参加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阶级、阶层和社会集团，都属于人民的范围；一切反抗社会主义革命和敌视、破坏社会主义建设的社会势力和社会集团，都是人民的敌人。**”这样，毛泽东便把他和中共各级官僚特权阶级等统治者，囊括在“人民”或“无产阶级”之内，与其相左的异己者、持不同政见者乃至持中间立场的老百姓，不经调查，便知其为5%，都被他驱赶出“人民”或“无产阶级”范围，钦定为“阶级敌人”，或曰“反动派”、“反革命分子”等等。由此推见，毛氏所谓的“人民当家做主”，囊括在“人民”中的统治者，便当仁不让地“当家做主”；毛氏所谓的“为人民服务”，囊括在“人民”中的官僚特

权阶级，便又当仁不让地接受“为人民服务”。因此，本书要为“人民”一词正名：“人民”是泛指区别于政府官员的工、农、兵、学、商、文、宗教和居民等普通民众，或曰老百姓；无产阶级则是失去了一切生产资料已变成备受雇主和官僚特权阶级盘剥、奴役的老百姓。本书的“人民”称谓，与毛氏强加给“人民”一词的内涵绝然不同。

当毛泽东代表95%以上“人民”发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时，笔者同绝大多数老百姓一样，被迫身陷于浩劫之中；浩劫中历和目睹的各种事件，至今还历历在目。当研究了散落社会上少部分很不完整的资料，以及研究了被官方批准出版的部分个人著作后，笔者认为：

无产阶级专政理论是权力拜物教理论，它使谄练帝王厚黑权术的毛泽东个人权欲恶性膨胀，从而使他能够利用无产阶级专政、社会主义革命和“人民”名义，疯狂地、无法无天地排斥异己、镇压反对派和屠戮无辜者。

在“人民”、阶级斗争和党的领导即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熏陶下，中国固有的封建忠君文化进一步发展，人质情结即斯德哥尔摩综合症（6）进一步发酵，一代共产党人为了尽忠、一代臣民为了表忠，他们争先恐后为树立毛泽东的绝对权威呕心沥血，自愿或违心地自残、相残，更有甚者，甘愿为毛虎作伥、当枪使、充炮灰，到头来虽惨不忍睹地成为毛泽东坐鼎江山的祭品，也在所不辞。

从毛泽东有计划、有步骤地打倒刘少奇、林彪和拖死周恩来、到最后想打倒而没能打倒邓小平的**火并**中，在包括那些罹难的共产党员在内的中国共产党人集体犯罪下，中国老百姓特别是那些毫无权利的弱势者和那些面对暴政威武不屈的先知先觉的义士们，他们在贫病交迫下，在一波接一波的红色恐怖中，备受煎熬、欺凌、蹂躏和屠戮，为“君臣”之间的争斗从而蔓延致“臣民”之间的争斗，付出了惨痛的、血淋淋的代价。

因此，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历史，是一部无产阶级专政导致权力失衡因而引发权力重新分配的历史，亦即是一部毛泽东与中共其他领导人争权夺利的**内讧史**：文革之始，自封为“无产阶级”的左派，镇压右派，左派上台；文革之末，以“人民”自居的右派，发动宫廷政变，击败左派，右派掌权。在中共左、右两派激烈**火并**中，中国老百姓在“舆论一律”的洗脑下，许多人在为毛泽东的“继续革命”摇旗呐喊中，有两三百万人丧命，一千多万人致伤、致残，亿万多人受到株连、迫害，国民经济也因而倒退到了崩溃的边缘。——**这就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全部历史！**正是：

毛泽东挟私夺权，老百姓蒙昧丧生！

马列主义的无产阶级专政理论所造成的浩劫，是共产党人集体犯罪的结果：他们只认其功，否认其罪。1998年，在列宁主义的故乡，时任俄罗斯总统的**叶利钦**，在为列宁下令惨杀的尼古拉二世及子女的安葬仪式上说：“多年以来，我们一直隐瞒着这起令人毛骨悚然的罪行。但是应该说真相，叶卡特琳堡的这桩迫害案成了我国历史上最耻辱的一页。我们安葬遭到无辜枪杀的人，是为了替我们的先人赎罪。固然，直接行凶者是罪人，几十年里为这桩血案辩护的人也是罪人。我们大家都是罪人。”遗憾的是，继承马列主义的中共各级当权派，至今没见一个人为过去的杀戮忏悔。

产自于西方的马列主义与中国毛泽东思想相结合的**马列毛主义**，是权力拜物教文化，也就是以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与美好的均富理想相搀合的乌托邦共产主义，它的灵魂，则是无产阶级专政理论。马克思主义在他的故乡德国和产地英国，早已被那里的人民所唾弃，因而

使那里变成了自由主义的发祥地；列宁主义产地苏联，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也改变了颜色，被毛斥为修正主义。（到了九十年代初，苏联修正主义者，纷纷抛弃马列的无产阶级专政理论，把俄共变成为自由竞选的在野党。）但这个早已被西方唾弃的理论，在中共和毛泽东手里，却变成了香饽饽，被他们崇拜得走火入魔。在他们的“科学”包装下，乌托邦共产主义及其灵魂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两个主要特征，强烈地表现了出来：“暴力崇拜”和“目的崇拜”。马克思说：“共产党人不屑于隐蔽自己的观点和意图。他们公开宣布：他们的目的只有用暴力推翻全部现存的社会制度才能达到。”恩格斯说：“革命就是一部分人用枪杆、刺刀、大炮，即用非常权威的手段强迫另一部分人接受自己的意志。”列宁说：“暴力比100次辩论更有效。”因而毛泽东说：“枪杆子里面出政权。”“政权就是镇压之权。”继而邓小平说（网传待查）：“杀200人，保20年稳定。”“学生娃不听话，一个机枪连就解决了。”等等，就是“暴力崇拜”的吼叫。“目的崇拜”就是“成王败寇”。“罪恶导师”马基雅维里说：“目的总是证明手段正确。”普列汉诺夫谴责他的学生列宁，为了胜利“甚至可以和魔鬼结盟。”斯大林对毛泽东说：“胜利者不会受责备。”因此，打着虚幻飘渺的乌托邦共产主义——“共产主义天堂”理想主义旗号的革命者，只要胜利了，他们的任何谎言、任何妖魔化敌人的卑劣手段，都是革命者的最佳选择，都应加以美化包装，任何批评、责备，都是对革命的“反动”。这就是二十世纪的世界造成一亿多人非正常死亡的共产党人的无产阶级专政理论。在中国，这种崇拜丛林法则的理论，发展到文化大革命，已演变成马列加秦始皇主义，或曰马列毛主义。

所谓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实质上是一场颠覆华夏文明、挑战普世价值的丛林赤色文化大革命，或曰**赤化革命**、**痞子革命**。从广义上来说，赤化革命从中共诞生之日起已经开始，迄今尚未终止；从狭义上来说，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赤化革命的一部分，从毛泽东利用中共组织下令实施《五一六通知》起，到毛泽东死为止。本书评说的重点是狭义上的文革。这种乌托邦共产文化的存在和发展，必然导致制衡缺失、权力腐败，诚信式微，道德沦丧，从而为中华民族招来苦难和两极分化。这是造成今日中国腐败积重难返的根源。

遗憾的是，当今研究文革者，多从左、右来褒贬赤祸中的人物和事件，较少触及赤化的根源：乌托邦共产主义及其中国化了的马列毛主义学说。他们论述文革的长篇大作，远不如普通网民来得干脆：都是马列惹的祸！因此，**不彻底清算文革的谎言、野蛮和邪恶，不推倒压在老百姓头上的马列主义和毛泽东两座大山，并用自由主义和民本思想的民主政治取而代之**，今日中国之腐败，将继续恶化下去，直到酿成新的全面的大规模的流血冲突，犹如当年慈禧为满清自掘坟墓那样：囚禁光绪，扼杀变法，从而酿造了孙中山“驱逐鞑虏”的辛亥革命！

文革年代，是痞子当权时代，因而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的时代。一个堂堂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家主席，在被毛泽东扣上“叛徒、内奸、工贼”等罪名后，未经审判便失去了人身自由，旋即失去了做人的最基本的尊严和权利，直到被折磨致死。想想看，一个位高权重、处于“万人之上，一人之下”的国家主席的命运尚且如此，其他人特别是下层老百姓的命运呢？看看本书各篇，你就会找到答案。

**我们不应忘记文革！
我们不能忘记文革！
我们无权忘记文革！**

忘记和掩饰历史真相就是背叛：**背叛国家！背叛民族！背叛文明！**

但是，抨击文革的野蛮，是为了光复仁爱，揭露中共的谎言，是为了恢复诚信，批判马列主义的蛊诱，是为了重修社会宽容，清算毛泽东的邪恶痞积，是为了重塑真、善、美的华夏文明！因此，抨击、揭露、批判和清算的目的，在于还原真相，了解实情，让人们记住历史，吸取教训，敦促开明的政治家和有良心的革命家们，以世人称道的儒释道华夏文明、以前美国总统罗斯福提出的言论、信仰、免于匮乏、免于恐惧的“四大自由”和以前南非总统曼德拉倡导的宽容、和解、自由、非暴力的现代文明，重塑中国的未来，断不可有**以其人之邪道，还治其人之罪身的恶念！**

本书引用的文章和图片，许多都是从网络上流传的文章和数千张图片中筛选出来的。这些文章和图片，好似闲言碎语，又似苦口良药，但却真实地、生动地记述了那个时代里的愚昧、邪恶、野蛮和疯狂。

本书引用、摘录和笔者改写的原文等资料，大多是从网上复制、下载的。因此，除笔者“评说”和改写的文字外，其他文字、图片，大多是网络社会提供的。如果说网络社会提供的文字不实，图片有假，至少也是当局死不解密档案造成的。因为，有权接触档案的御用学者、专家们，大多都是以真假搀合来打扮历史的，许多人都是制造谎言的能手，他们甚至以假批假，以黑打黑，从而酿成了“小道消息”的泛滥。因此，在文革大部分资料仍处于官方绝密尘封的条件下，人们对这些文章、图片等资料的真实性见仁见智是可以理解的。在谎言充斥的时代里，本书所引用的资料是有选择的，并认同其真实性；但也不排除判断上的失误，特别是在统计数据精准上。

今日大陆所谓“正史”，早已成了任由权力打扮的小姑娘。真实历史呢？那些真实的档案纪录，能销毁的大都设法销毁了，能篡改的大都设法篡改了，能回避的也都设法回避了；还有相当一部分当时明令“不准作纪录”的口头“命令”、“决定”、“通知”、“吹风”和“谈话”等等，随着年深日久，当事人或已作古，或年渐作古，调查越来越困难；他们中虽也有留下回忆录者，但有利害考量或惮于权力“主旋律”的淫威，有的对真实敏感问题躲躲闪闪，有的则为推卸责任而混淆视听，等等，其历史的真实性还有待仔细考证；剩下来的那些没法销毁、篡改和回避的真实历史，其中的多数，又被严严实实地尘封于国家绝密文档中，哪允体制外学者接触？怎能叫老百姓翻阅？那些正直而认真的史学家，那些有良心的当事人和旁观者，以及那些备受蹂躏的受害人，他们的专著、回忆录里的任何客观议论和如实描述，都不可避免地要痛诉中共及其领袖们的胡作非为和残忍，必然侵害中共当权者的既得利益，触忤中共设定的“主旋律”的底线，因此，他们的专著和回忆录，不是被封杀于“摇篮”里，便是被拒于出版界之外，哪容老百姓知晓？那些老百姓容易接近的“文革遗迹”呢？例如，重庆市所剩下的那座全国唯一的红卫兵陵墓，当局曾不顾人民反对，借筹建宾馆的名义准备铲平它，打算彻底消除见证文革的痕迹，使其永远从老百姓的视野中消失。只是由于人民的强烈反对，才使这座陵墓暂时得以保存！

历史不应被权力垄断，不应被权力任意打扮。我们有责任不让昨天的权力支配现在，更有责任不让今天的权力任意打扮过去，**强暴现在，遥控未来**。历史的公正性在于：权力虽可以任意打扮历史，但历史不会去打扮权力，也不会让权力打扮、篡改历史的行径得逞于永远。本书之所以为“评说”，是为了揭露谎言，因而，它不屑与那“舆论一律”、“主旋律”

或“导向”即权力打扮的“正史”为伍。

十年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历史，是一部聚集世界共产主义运动反人类罪恶的历史，它从反面警示人类，世界上还存在着谎言、野蛮和邪恶；因而，它又是一部光复真、善、美华夏文明和启迪自由、民主、人权普世价值的教科书。

笔者已老迈，如晚年有幸看到被中共“恩准”解密的文革档案资料，也许还能来得及修正可能的判断失误，以“评说”正视听。

我期待着。

前言附注：

附 1、右派

这里所说的“右派”是中共党内派别的左、右分类，而非中共制造的“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右派分子”。

附 2、“神仙会”

“神仙会”是六十年代初，中共恩赐给各民主党派发扬民主的方式。他们恩赐在民主党派内，可以实行自己提出问题，自己分析问题，自己解决问题的“三自”和**不打棍子，不戴帽子，不抓辫子**的“三不”方针，借以改善中共与民主党派的关系，端正民主党派成员中对“三面红旗”的“错误”认识，消除他们的紧张、不安和抵触情绪，团结一致，紧跟共产党。但到 1962 年 9 月，当毛泽东提出“**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后，恩赐的“神仙会”，旋即消失。

附 3、“三自一包”

在饿殍遍野的“三年人祸”后，毛泽东退居二线。刘少奇、邓小平等人在主持一线工作期间，“修正”了毛为农村人民公社制定的“一大二公”指导思想，提出并实行**自留地、自由市场、自负盈亏和包产到户**的政策，简称“三自一包”，缓解了中共与农民的对抗，扭转了农业大幅减产和大面积饥荒的局面。

附 4、“三和一少”

1962 年上半年，中共中联部部长王稼祥等人，针对毛泽东的“三斗一多”提出的对外政策建议。“三和一少”即“**对帝国主义、修正主义和各国反动派要和，对各国革命援助要少。**”而毛泽东的“三斗一多”，与此相反，即“**对帝、修、反要斗，对各国革命援助要多。**”

附 5、《世界人权宣言》

《世界人权宣言》

——联合国大会于 1948 年 12 月 10 日通过(联合国大会第 217 号决议, A/RES/217)

主要条款摘要：

人人生而自由，在尊严和权利上一律平等。他们赋有理性和良心，并应以兄弟关系的精神相对待。

人人有资格享受本宣言所载的一切权利和自由，不分种族、肤色、性别、语言、宗教、政治或其他见解、国籍或社会出身、财产、出生或其他身份等任何区别。

人人有权享有生命、自由和人身安全。

任何人不得加以酷刑，或施以残忍的、不人道的或侮辱性的待遇或刑罚。

人人在任何地方有权被承认在法律前的人格。

在法律前人人平等，并有权享受法律的平等保护，不受任何歧视。人人有权享受平等保护，以免受违反本宣言的任何歧视行为以及煽动这种歧视的任何行为之害。

任何人不得加以任意逮捕、拘禁或放逐。

凡受刑事控告者，在未经获得辩护上所需的一切保证的公开审判而依法证实有罪以前，有权视为无罪。

任何人的私生活、家庭、住宅和通信不得任意干涉，他的荣誉和名誉不得加以攻击。人人有权享受法律保护，以免受干涉或攻击。

人人在各国境内有权自由迁徙和居住。

人人有权离开任何国家，包括其本国在内，并有权返回他的国家。

人人有权在其他国家寻求和享受庇护以避免迫害。

任何人的财产不得任意剥夺。

人人有思想、良心和宗教自由的权利。

人人有权享有主张和发表意见的自由。

人人有权享有和平集会和结社的自由。

人民的意志是政府权力的基础；这一意志应以定期和真正的选举予以表现，而选举应依据普遍和平等的投票权，并以不记名投票或相当的自由投票程序进行。

人人有权工作、自由选择职业、享受公正和合适的工作条件并享受免于失业的保障。

人人有享受休息和闲暇的权利，包括工作时间有合理限制和定期给薪休假的权利。

人人有权享受为维持他本人和家属的健康和福利所需的生活水准，包括食物、衣著、住房、医疗和必要的社会服务；在遭到失业、疾病、残废、守寡、衰老或在其他不能控制的情况下丧失谋生能力时，有权享受保障。

人人都有受教育的权利，教育应当免费，至少在初级和基本阶段应如此。

人人对社会负有义务，因为只有在社会中他的个性才可以得到自由和充分的发展。

附 6、人质情结

人质情结即斯德哥尔摩综合症（Stockholm syndrome），是指罪犯的受害者对于罪犯产生情感，甚至反过来赞赏或帮助罪犯的一种情结。

1973年8月23日，两名有前科的罪犯，在瑞典首都斯德哥尔摩市内抢劫一家银行失败后，劫持了三女一男银行职员做人质。绑匪在劫持人质达六天的时间里，曾多次威胁被劫持者的性命，但有时也表现出仁慈的一面。在错综复杂的心理转变下，四名人质竟抗拒政府营救他们的努力，并帮助绑匪逃跑。这起事件发生几个月后，四名遭劫持的银行职员，仍然对绑架他们的人显露出怜悯的情感。他们拒绝在法院指控这些绑匪，甚至还为他们筹措法律辩护的资金。据说，其中一名遭劫持的女性，曾多次探望服刑中的一名绑匪，并与他订婚。

心理学者认为，产生斯德哥尔摩综合症的四个条件是：

(1)、要人质切实相信生命正受到威胁；(2)、施暴的人会给人质施以小恩小惠；(3)、控制人质的信息来源和思想；(4)、让人质感到无路可逃。

产生斯德哥尔摩综合症的四个条件，可以发生在一个或几个孤独人身上，更容易发生在相对封闭社会里的某些群体里。

有心理学者在评论专制社会里的人质情结时说：生活在各种各样风险下的人们，被迫无

奈地学会了妥协；对于长期经受着欺负、压制、剥夺的群体而言，一旦有人给予他们点滴的好处，他们或许就会失去理智，黑白不分，甚至不吝感情地去赞美那些直接或间接伤害过他们的人。

07-作者想说的话

作者 于松然

1、总算发完了

2015年5月16日，笔者在阿波罗发表了“八十抒怀”和“我的墓志铭”两篇短文，意在纪念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四十九周年。自此，我开始按“总目录”顺次，逐章逐篇发表约百余万言的《草根评说：文革—毛泽东》一书（初稿），迄今已整整四个月。

逐章逐篇发表《草根评说：文革—毛泽东》一书是我的宿愿。但这个简单愿望，在大陆，是可望而无法触及的水中弯月。

诗仙仰天长啸：“烹羊宰牛且为乐，会须一饮三百杯”！而今大陆诗坛有几人敢这样纵情？笔者一介草根，在写这部书的过程中，因瑟索而小心翼翼：一怕没有写完身先死，二怕没处刊登白搭工，三怕没有人看遭耻笑，四怕没法出版变垃圾。可见，笔者与李白的豪情相比，乃天上地下也！

不过，笔者有草根的自信：他会生长；即使枯萎，也是草料、绿肥。不论幸遇浇灌，还是残遭践踏，笔者都会用自我的视角，去抒发自我的观点，用自我的方法，去批判毛泽东和中共在文革中的谎言、野蛮和邪恶，撕开他们的画皮，让中国人都能看清他们欺世盗名的真面目。写作自然离不开继承和借鉴，更不能缺乏创新和发展，但在继承与发展、借鉴与创新中，要自我作古，力争写出自我，展现自我。笔者做到了吗？旁观者清，应由读者去评断。

英雄尚有无用武之地，况一草根耳！笔者年轻时自作多情，写些颂扬小品，因颂扬不到位，都被拒于报刊门外。中年投笔从业泥瓦匠，与粗犷同舟共济，与斯文渐行渐远。然而，出人意料的是，退休后忽现博客。这个不用严审便能以文展现自我的新事物，启迪了我，旋弃灰砂而从文字。但从文亦非坦途：正当我在“博客屋”中纵横驰骋时，突遭“腰斩”；继而又在腾讯、新浪、凤凰中寻觅宽容者，先后均被拒之于门外；所幸网易胸怀较宽，竟容我多年，不料，容到今年5月，也对我痛下封杀之手。我陷入困境。我生在大陆，长在中华，从未离开中国一步。我爱大陆人，钟情于在毛泽东暴政下死难的数千万同胞，因而，我要为他们而写，为他们鞠躬尽瘁，发誓以书告慰他们的在天之灵。正当环顾前后左右而“疑无路”时，翻墙软件向我展示了“柳暗花明”的境界，使我这个年逾八旬步履蹒跚的一介草根，歪

歪斜斜地走进了“太阳神”之家——阿波罗。

远古，太阳神阿波罗，惧于众神领袖宙斯的独裁，不敢借火种给普罗米修斯，却“纵容”他来偷，结果天神“偷窃”成功，给人类送来了光明；而今，阿波罗不畏共产主义的残暴，敢把“火种”交于一介草根，支持他在阿波罗里发表他所写的书，在告慰死难同胞的同时，去唤醒今日中国大陆还在昏昏欲梦中悠然为奴的芸芸众生。

在阿波罗，因眼神不好，笔者用放大镜对句子、错别字、标点等文字上的谬误进行逐篇校勘，力图把常识性错误降到最低水平；又因年老体弱，曾暗暗祈祷：太阳神保佑，不要让我突然倒下，蔽护我在阿波罗里把《草根评说：文革—毛泽东》一书发表完。祈祷应验，在阿波罗的支持下，9月16日，书终于在网上发表完，尽管图表瑕疵使版面不尽如人意。

笔者还有个“远大的理想”：求太阳神再保佑，让我再活个三到五年；到那时——在我倒下之前，笔者也许能看到，有众多读者、专家和学者，因阿波罗而愿意评论我的书，有众多出版商，因阿波罗而愿意出版我的书，大陆的老百姓，也因阿波罗而能读到我的书；到那时——在我倒下之前，笔者将同千千万万个志士仁人一起，踏着普罗米修斯的足迹，高举着阿波罗的“神火”，把长夜难明的中华大地照亮！

衷心向阿波罗致谢！

（2015.9.16 发表于阿波罗网）

2、本书步履艰难

由于笔者年迈，且**高血压曾使我一度搁笔，心绞痛还差点要了我的命**，因此，计划每写成一篇初稿，都要设法发表出去，借以能在有生之年实现告慰受难者再天之灵的心愿。

本书最早写成的二三十篇初稿，发表在“博客屋”的博客里。因无留记录，“博客屋”遭封杀后已无法查核。

在网易上建立“一介匹夫博客”始于2006年12月3日，被全面封杀于2015年5月15日，历时八年半。在“一介匹夫博客”里，笔者曾先后发表本书初稿122篇。其中：首先发表的《评说01：学雷锋运动》一文，是在2007年3月10日；遭全面封杀前的2015年5月12日，发表了最后一篇《评说122：简评人民公社运动》。

当“一介匹夫博客”遭全面封杀后，笔者曾以“rsrr”笔名在凯迪网上发表过51篇本书**删节稿**，但大多数遭到了封杀。

由于在大陆媒体上已无发表本书的希望，只好“越界”出走阿波罗。在阿波罗博客里，历经四个月的努力，到2015年9月16日，把本书**第一稿**（初稿）全部发表完。

接着，本书**第一稿**又发表在明镜博客上。从2016年1月3日到2016年5月4日，本书拆分成323篇，在那里全部发表完毕。

如今，9月23日，本书**第二稿**修订业已完成，往哪里发表，用什么方式发表，还是个未知数。

由于我的亲属好友多不支持我撰写此书，更有反对者，因此，从开始搜集资料到书写、编辑、修订、校对本书，全由我一人运笔敲键。由于年老、体弱、眼花、健忘，敲键中不断发生常识性错误，运笔中很有力不从心之感。但值得庆幸的是，由于有老伴在生活上的悉心照料，使我能够在倒下之前，得以完成本书的写作和修订！

2016.10.1

(2017.02.13 发表于明镜博客)

3、本书的跋语

笔者自十三岁被中共“解放”以来，便生活、工作、退休于中国大陆的社会主义社会里，未曾迈出过国门一步。在社会主义社会里，从幼稚、彷徨、挫折到而后的省悟中，笔者自然而然地产生了这样一个理念：

当某种思想独霸权力时，就会变成魔鬼：发酵出诱人的、酣畅甜美的毒酿，或使人在昏昏欲梦中悠然为奴，或使人在飘飘欲仙中安然瞑目。

笔者不愿被“昏昏欲梦”或“飘飘欲仙”，更不想因而“悠然为奴”或“安然瞑目”，于是，便有了《我的墓志铭》。2010年4月6日，此文发表于“网易博客”。全文如下：

我的墓志铭

铭者：于松然（曾用笔名：一介匹夫、ysrr0405）

光阴荏苒，来去匆匆，2010年4月5日，我已走过了七十五个春秋的人生路程。举目回顾，岁月乖谬，诸多遗恨，尽囊心底。十四年贫困，八年军旅，十二年流配，耗尽了充满活力的前半生。后半生与砖石灰砂为伍，栖栖琐琐，直抵黄昏。世纪之初走出工地，面对西风残照，坐在麻将桌边，砰砰啪啪地消磨暮日，打发余生。

四十多年前，一位老农曾对我说：“你大难不死，必有后福！”苟且偷生到七十五，何福之有？

一日，忽有所感，遂提笔写了个纪念“七一”的文章——“中国出了个毛泽东”，贴到某《毛泽东论坛》上。不料，文章一出，招来一阵喧闹。一位最终同意放行的版主恶狠狠地骂道：“疯狂如是者，鲜！人能狗屁者，能！”在“同意放行”后，发出“立此存照”的威胁，大有举兵讨伐或“秋后算帐”之势。果如是，有人不待“秋后”便骂将起来：“狂徒”、“台毒”、“狗东西”、“大傻B”等等，污秽之声不绝于耳。但毕竟是网络时代，虽有“主旋律”之剑悬顶，却也难以再用“舆论一律”扼杀一切呼声。在辱骂声中，不同声音也迸发了出来：“入木三分”、“一针见血”、“非常透彻”等文字跃然网上，更有甚者，竟直呼：“Great article!”倍受鼓舞的我，一个长期在思想强暴下见无知唯唯称是、遇权力谦谦躬腰的软骨患者，一个

长期逆来顺受、奴气十足的丑陋的中国人，腰板居然硬挣起来，要在苟延残喘的风烛晚年，只身搏击，傲然为自由立言：用证词与独裁者的谎言、野蛮、邪恶抗争，以书告慰在其暴政下数千万死难同胞的在天之灵！于是，2006年5月，年垂古稀的我，与搜集、鉴别资料的同时，直书《评说文革》，开始了不自量力的艰难跋涉！

高血压曾使我一度搁笔，心绞痛还差点要了我的命。盖因我不善疏导情感：有时写着写着便拍桌子，发泄凝集于心中的愤懑；有时写着写着已泪流满面，甚至情绪失控而大放悲声。经验训迪于我：评述需要感情，更需理性；只有正大而深刻的理性，才会有丰富而高尚的感情。

病魔窥伺的威胁，使我不得不在计划尚未完成之前，抢先发表一些粗糙尚待校勘的初稿，借以圆就以书告慰受难者的心愿。假如一日，我被高血压或冠心病突然击倒，乃至在眼疾的折磨中了却一生，既是未能成书，也会因在网上选发了数十篇初稿而含笑于九泉，陶醉于冥宫！

有人著书说，毛泽东“**功劳盖世，罪恶滔天**”。数十年的生活经历，使笔者只能接受后者，无法认同前者。毛泽东对中国、对中国人民有什么功劳呢？曾为八大中共中央副主席的陈云，曾这样评价过毛泽东：

“建党他有份，建国他有功，治国他无能，文革他有罪！”

陈云说毛“**建国他有功**”的“功”在哪里？笔者认为：毛泽东的“功”在他“**权谋盖世**”，击败了国民党，为中共夺得了天下，达到了改朝换代的目的，因而“功”在共产党，“功”在少数既得利益者，不在中国和中国老百姓。看一看非毛主义的港、澳、台、新加坡的繁荣和老百姓富裕，再看一看毛泽东时代的落后和老百姓贫困，他“建国”的“功”在哪里不昭然若揭了吗？

陈云批判毛泽东说：“**治国他无能。**”但笔者认为，毛不仅是“无能”，而是有罪！请看，毛泽东在“建国”后执政二十七年间所发动的二十七次政治运动从而给中国老百姓制造的**四大灾难**：

以镇反、肃反、土改、合作化等运动和每年逢年过节的“严打”为名义的大屠杀，全国枪杀、打死约为500~600万人，使中国老百姓长期处于红色恐怖中；

以三大改造和人民公社为手段的大掠夺，使全国所有资源在“国有化”的名义下，变成了毛泽东可以任意挥霍的党产，而老百姓则变成了名符其实的无产者和奴仆，中国人民自此处于“瓜菜代”的长期贫困中；

以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为“三面红旗”所引发的大饥荒，在中国制造了3,000~4,500万个饿殍，而官方只承认“非正常死亡”3,767万人；

以毛泽东“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大文革，导致全国200~300万人丧生，1,000多万人伤残，国民经济也被革命到了“崩溃的边缘”。

毛泽东给中国老百姓制造的四大灾难，证明他是个谎言、野蛮、邪恶的化身，是个反人类暴政的制造者，因而，把他罪行定位于“**罪恶滔天**”，恰如其分。

经历了数十年的亲身体验、观察和考证，笔者得出结论：毛泽东和他领导下的中共，是谎言、野蛮、邪恶的化身。对此，十多年前，笔者写了一篇讨毛檄文“中国出了个毛泽东”，

打算在 2001 年“七一”八十周年时发表。但因阻力重重，茫茫互联网，竟没有一处允许发表的地方。第二年春天，一个偶然机会，使笔者找到了一个放行平台。现将 2002 年 3 月 17 日发表在《文学城》里的一个《毛泽东论坛》上的全文，照抄如下：

中国出了个毛泽东

——纪念“七一”八十一周年（请版主高抬贵手放行）

作者：一介匹夫

毫无疑问，毛泽东是天才，是个天才的政治阴谋家和军事策略家；也毫无疑问，毛泽东经济上是个蠢才，近乎白痴。他的天才给中国带来的不是福，而是祸；他的蠢才，给中国带来的是空前的大灾难！

一、中共曾依附于苏俄帝国主义。**中共成立之初是个附庸党**。它不仅接受前苏联大量卢布，组织上接受前苏联共产国际特派人员（如鲍罗廷、马林、李德等）的直接领导，而且当时的中共政要，许多还是经过前苏联训练或派遣的特工，毛泽东就是这个组织的领导成员之一。

二、引进马列主义。不应拒绝引进先进思想或主义，但马列主义不是什么先进主义，尽管它的存在对净化和完善资本主义有一定意义。当马克思主义变成马列主义时，这个主义已经从乌托邦蜕变成独裁主义。当中国刚刚摆脱封建王朝的羁绊向共和制艰难迈进的时候，**毛泽东和他的同夥接受前苏联输入的这种主义，使中国的封建专制以打着民主反民主的旗号大发展起来**，刚刚起步的科学和民主事业，也因而发生了大逆转！

三、北伐和国共两党之间的内战，实际上是一场政府与外国代理人之间的战争。国民政府通往“宪政”道路上的“军政”政策，受到了外国人的干预。支持内战的不仅有日本人，也有英、法等国人，而**中共则是前苏联在中国的代表**。毛泽东的天才拯救了红军，使它在陕北得以喘息，并站稳了脚根。

四、抗日战争中，毛泽东打着爱国旗号搞卖国。当是时，北有日本支持的“冀东自治政府”，南有前苏联为后盾的“瑞金苏维埃”，且军阀割据，战火不断，迫使蒋介石政府实行“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毛的天才使他成功地抓住了蒋介石这一政策上的漏洞，以攻其一点不计其余的手法，达到了褒共贬蒋的宣传目的。但在实战中，他消极抗战，甚至坐山观虎斗，以保存和壮大实力，待将来与蒋决战。中共不乏爱国将领（如彭德怀），因积极抗日（百团大战）而备受毛的指责。毛泽东消极打鬼子，鬼子心领神会，以大军压蒋，发动了数十次大规模的战役，使国民党军队损失惨重，从而给中共创造了大发展的良机。在抗日战争中，**中共军事主力从三万多人发展到一百二十多万人，相当于国民党军队的三分之一，但毙伤鬼子兵不及国民党兵的三十分之一！**二十多年后，毛泽东在会见日本首相田中时，感激之情溢于言表，无耻地赞美侵略者说：“**皇军有功！**”今天，毛的阴魂不散，他的信徒精英们，利用毛遗传的面壁虚构和巧言令色的密术，继续传扬毛的“摘桃”谎言，力图使人相信，八年抗战的胜利是地雷战、地道战、麻雀战和铁道游击战的胜利，千方百计回避和抹煞这一历史事实：国民政府其军队消灭了六十多万鬼子兵，并与美、英、苏、法结成同盟国，取得了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成为五大强国之一，从而顺理成章地成为安理会的常任理事国！

五、四年内战是美苏两大集团支持下的代理人战争。**这场不义战争，以数百万中国人的生命为代价，达到改朝换代的目的**，并由此确立了社会主义阵营以苏俄帝国主义为霸主的地位。如果说已蜕变为独裁者的蒋介石是一条美帝国主义的走狗（这个帝国主义没占我一寸领土），那么，即将变为独裁者的毛泽东呢？历史已经证明，当时他认敌为友，把霸占我一百六十多万平方公里领土、武力逼外蒙独立、屠杀我数万同胞的苏俄帝国主义拜为领袖，

推为霸主，因此，他是一条不折不扣的苏俄帝国主义走狗！

六、抗美援朝战争是毛泽东决定的最大一次祸国战争。二战后，美苏争霸的格局已经形成。美国的战略重点在欧洲，在亚洲是保卫日本和维持各国边界现状。苏俄的战略重点也在欧洲。为了控制中国，同时削弱美国在欧洲力量，**斯大林设计了一箭双雕的战略**，用刚刚取得内战胜利而好大喜功的毛泽东去牵制和消耗美国，同时置中国于股掌之中。为此，他命令金日成发动了朝鲜战争，继而出枪出炮（后又要钱）要毛泽东出兵援朝。美国杜鲁门政府察觉到苏俄的谋图，当他们介入韩战时，就责令远东美军不得扩大战争，并撤换了扩战派司令麦克阿瑟，最后以有限的兵力和适当的战术，恢复了战前的平衡，从而保证了他们在欧洲对前苏联的优势力量。在美苏争霸中，毛泽东中了斯大林之计，愚蠢而不光彩地充当了他导师的打手。他以五六十万中华英雄儿女的生命和数十亿美元以及被孤立二十多年的巨大代价，出兵朝鲜，为霸主苏俄帝国主义立下了赫赫战功，保卫了金日成父子独裁的家天下。对这场严重损害我国国家利益的不义战争，他竟美其名曰为“保家卫国”。毛愚弄中国人的无耻伎俩，早已大白于天下；然，时至今日，还有那么一些“爱国”精英们，为那场可耻的祸国战争叫好，令人作呕！

七、出卖民族利益，承认外蒙古独立。民族自决是现代文明的原则，但外蒙古是在苏俄帝国主义刺刀胁迫下“独立”的，与民族自决风牛马不相及。当毛泽东厚颜无耻地宣布“一边倒”并宣称前苏联为“老大哥”、卑躬屈膝地尊称斯大林为“导师”并自称为“学生”时，卖国贼的嘴脸裸露无余：不顾绝大多数中国人（包括蒋介石政府在内）的强烈反对，公然把刺刀胁迫下“独立”的外蒙古，说成是“**蒙古人民在十月革命的影响下，脱离了中国的反动统治**”，悍然承认外蒙古独立。就是这个“独立”的外蒙古，直到九十年代初前苏联解体，才从苏俄帝国主义的卵翼下部分解脱出来。今天，台湾陈水扁政府要承认外蒙古独立，被台湾人民骂为“卖国”，那么，当年的毛泽东呢？同是中国人，我们大陆人不该反省吗？

此外，对于苏俄帝国主义霸占着我一百六十多万平方公里的领土，毛和他的继承人没有一个打算设法讨回。相比之下，日本各届政府，为要求苏俄归还北方领土，数十年如一日地坚持不懈，其精神令人钦佩！

八、残酷的阶级斗争是毛泽东进行政治统治和迫害的主要手段。对于阶级斗争，毛泽东说“要天天讲、月月讲、年年讲”。从五〇年镇反开始，接着便是五一～五二的对知识分子“改造”斗争，五二年的“三反”“五反”，五三年的批高（高岗）斗饶（饶漱石），五四年批俞（俞平伯）斗胡（胡风），五五年的肃反，五七年的反右，五八年的拔“白旗”，五九年的反彭（彭德怀）黄（黄克诚）张（张闻天）周（周小舟），六〇年的反后进，六三～六六年的“四清”，六六～七六年的文革以及其间的广西吃人、北京、湖南大屠杀，等等，在和平的环境里，制造了三百多万件冤假错案，数百万人（包括他的同事、战友）都惨死在他的屠刀之下，数十万个家庭妻离子散、家破人亡，数千万人被打、抓、管、关和发配，无辜受株连近两个亿。二十七年间，残酷的阶级斗争使仁义理智信和真、善、美的中华大地**人性泯灭，道德沦丧，假恶丑横行天下，批斗杀甚嚣尘上**。如果允许人们把那斑斑血泪写成回忆录的话，全世界纸张必将告罄。毛这个歇斯底里的迫害狂和杀人狂，临死前还发疯似地叫嚷：“**不斗能行吗？**”他那句著名的“**我们超过秦始皇一百倍**”的狂叫，活画出他那副独夫民贼仇视自由、民主和人权的狰狞嘴脸！

九、毛泽东一意孤行的经济政策，证明他是祸国殃民的罪魁祸首。毛在搞政治阴谋和军事策略上是行家里手，经济上则是个蠢才，甚至近乎白痴。内战结束后，国家本应休养生息，但毛遵照斯大林的遗训，不顾人民的反对，悍然宣布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他的“一化三改造”、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大炼钢铁、工业学大庆和农业学大寨等经济政策，和他那些胡说八道的“八字宪法”、“鸡毛能上天”、“工业是拳头”和“农业是屁股”等所谓的经济理论，以及他一意孤行的“思想改造”、“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和“亦工、亦农，

亦文、亦武”反科学的人才观，给中国人民带来了空前大灾难！**六〇年饿死三千万**！广大农民长期在“瓜菜代”的贫苦中煎熬，城市居民在生活资料长期极度匮乏中艰难度日，而他和他的权贵们呢？他们则在“特供”中过着骄奢淫逸的生活。八十年代初，据专家们估算，在毛泽东统治的二十七年中，与同步国家相比，中国落后三十年！（二十七年中，平均 12.5% 的年增长率，是愚弄中国人的数字权术。）毛泽东倒行逆施的恶果，迫使他的比较开明的继承人**邓小平大刀阔斧地拨乱反正，改革开放**，引入资本主义经济模式，才使得被他搞得焦头烂额濒于崩溃的经济，起死回生，从而拯救了中国共产党！

十、如果说毛泽东有副卖国贼加祸国贼的特殊嘴脸，莫过于他在“支援世界革命”中的表现了。当我大片国土还沦没于帝国主义手中而绝大多数中国人还在饥寒交迫中挣扎的时候，为了争当世界领袖和导师，**他不顾国家利益和国情，左右开弓，与美交恶又与苏俄火并，使我国腹背受敌，失去了美苏争霸中的渔人之利**；他还不顾人民的死活，打肿脸充胖子，用大量人民的血汗钱去扶植波尔布特、金日成以及“红色旅”等等一类流氓加刽子手，受到了全世界人民的谴责；他还以第三世界领袖自居，用数十亿美元为阿尔巴尼亚、越南等国“输血”，结果，给我们带来的不是友谊，而是战争（越南）和反叛（阿尔巴尼亚），血本无归！

中国出了个毛泽东，这是我炎黄子孙们的不幸！

中国人民迟早会觉醒起来，彻底清除毛泽东经过精心包装的卖国加祸国的罪行。中共在天安门广场上为毛泽东僵尸建造的魔窟，不久的将来，必将改建成毛泽东暴政纪念馆，以告慰在其暴政下数千万死难同胞的在天之灵！

我为我炎黄子孙们呼吁：**还我自由！还我民主！还我仁爱！还我真善美！**

我为我炎黄子孙们祈祷：**中华民族将在自由、民主、正义和仁爱中复兴！**

也许有人认为笔者的思想过于激进，文字过于尖刻，但笔者写的都是客观存在过的历史事实，是任何人都无法抹去的。然而，在一党专政的“舆论一律”和“主旋律”统治下，中共却用历史装修主义或曰用主观构造的“规律”、“主流”、“典型”去强暴客观存在过的历史事实，对毛泽东的**盖世权谋**大加赞扬，借以掩盖毛泽东反人类的滔天大罪。请听，中共邓、江、胡、习四代领导人对毛泽东的颂扬：

中共第二代领导人**邓小平**说：“毛泽东思想这个旗帜丢不得。”又说：“我们写文章，一定要注意维护毛主席这面伟大旗帜，决不能用这样那样的方式伤害这面旗帜。”

中共第三代领导人**江泽民**说：“毛泽东同志和他的战友们，缔造了一个用马克思列宁主义革命理论和革命风格武装起来的无产阶级政党。”

中共第四代领导人**胡锦涛**说：“没有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浴血奋斗，就没有新中国，就没有中国社会主义制度。”

接着，中共第五代领导人**习近平**说：“毛泽东同志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战略家、理论家，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伟大开拓者，是近代以来中国伟大的爱国者和民族英雄，是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的核心，是领导中国人民彻底改变自己命运和国家面貌的一代伟人。”

从颂辞中可以看出，他们对毛的颂扬是千篇一律的；再翻开**江**在 1993 年、**胡**在 2003 年和**习**在 2013 年发表的纪念毛泽东诞辰的长篇颂辞看看，几乎没有什么区别。历史已经清楚地写下了这样的记录：是他们推翻了毛泽东暴虐的“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无产阶级专政理论，是他们推翻了毛泽东祸国殃民的“三面红旗”政策，是他们用改革开放推翻了毛泽东闭关锁国的计划经济体制，又是他们推翻了毛泽东引以为荣的反人类的文化大革命；一言蔽之：是他们推翻了毛泽东执政二十七年间**除一党专政和土地党国所有外**所主导的一切！然而，正

是他们这些人，却信誓旦旦地说要“**维护毛主席这面伟大旗帜**”。这是为什么呢？显然，他们都已从赫鲁晓夫批判斯大林从而终结苏联共产党一党独大的教训中，获得了灵感：为了确保中国共产党永远执政，永享既得利益，就要充分利用权力，千方百计地保护毛泽东这具僵尸，用令人作呕的颂辞去美化这具僵尸，不厌其烦地用重复重复的谎言去包装这具僵尸；因为，他们知道，毛泽东这面旗倒了，中国共产党就会像苏共一样垮台，他们的权力、爵禄以及他们子女、亲属的既得利益，都会付诸东流。

尽管有人认为笔者的思想过于激进，文字过于尖刻，但笔者不以为然。许多中国人在“舆论一律”和“主旋律”的长期洗脑下，在昏昏欲梦中沉醉于毒酿的酣美，在飘飘欲仙中回味毒酿的畅快。中国人被麻醉了，麻木了，软骨病、媚骨病已经由知识分子传染到贫苦老百姓中。因此，对中国人需要从背后击一猛掌，需用猛药启蒙。2005年4月28日，笔者通过在“网易博客”上发表的“写给在京打工小儿子的一封信”，发出了启蒙的呼喊。**全文如下：**

启 蒙

再过几天就是“五四”运动八十六周年了。

八十六年前，为了救国，先辈知识分子们引进了“德先生”（民主）和“赛先生”（科学），同时也引来了“马列先生”。二十多年前的六十年里，“马列先生”在西方家乡受挫，但在东方的异国他乡，却击败了“德赛先生”，使领袖崇拜主宰了中国，从而使中国陷入了空前的愚昧和疯狂中。今天，“马列先生”虽已不成气候，但其余威尚在，“德赛先生”仍在重压下呻吟。

为了解放“德赛先生”，今日中国迫切需要启蒙：民主启蒙、自由启蒙、人权启蒙、科学启蒙和道德启蒙。

在“马列先生”的领袖崇拜和帝王崇拜的余威主导的社会里，亦即由**权力意志**来定义和规范“民主”、“自由”、“人权”、“科学”和“道德”的社会里，启蒙者要付出代价。

这些代价包括：

在众多善良而愚昧的芸芸众生面前，启蒙者会被讥讽为失之偏激甚至刚愎自用的极端主义者；

在维护“马列先生”的“愤青”们面前，启蒙者会被诽谤为动乱制造者，甚至是汉奸、卖国贼；

在“马列先生”专政的制造者和实施者面前，启蒙者会被指控为破坏稳定图谋颠覆因而必需绳之以“法”的罪犯！

对于启蒙者来说，在非议、诽谤甚至刑讯面前坚定不移地走启蒙之路，付出这样的代价是责无旁贷的。

“天降大任于斯人也”，我不付出谁付出！

当**左派理想主义**受挫时，**专制务实主义**（1）便借机东山再起，取其而代之，恰似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的“**改革开放**”故事；但当专制务实主义招致贫富差距拉大、不平等加剧、腐败积重难返时，左派理想主义便乘势卷土重来，犹如二十一世纪初复辟文革的“**唱红打黑**”狂潮。为了不使“理想”与“务实”反复折腾我们民族，启蒙便成了今天中国当务之急。

要启蒙，就要揭露和批判毛泽东的中共在文革中的谎言、野蛮、邪恶，推倒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马列主义**和**毛泽东**两座大山，从而为光复真、善、美的华夏文明和重修自由、民主、

人权的普世价值扫清道路。2006年5月，笔者开始直书的《评说文革》，就是一剂启蒙猛药！

尽管笔者出身低微，一介草根，无法与那些御用专家、教授、学者、作家们平起平坐，而在当权者眼里，更是一株可以任意践踏的小草，但却责无旁贷地肩负起启蒙重任，不畏惧他人的讽刺和恐吓：在一些网站上，开辟一间博客小屋，以揭露和批判毛泽东在文革中的种种反人类暴行，去唤醒沉睡中的民族。

开辟博客并不顺利。当笔者在“博客屋”里小心运笔时，“博客屋”被查封，全军覆没；又当笔者试图在新浪、腾讯、凤凰上构建“平台”时，先后遭到了他们刁难式的拒绝，使“建筑”无法进行下去。然而，在“主旋律”的蒙蒙法网中，笔者最终在“网易博客”中找到了一席之地，先后发表了一百多篇批毛、评马列的《评说文革—毛泽东》初稿。尽管他们也查封了部分文字，但笔者还是要向他们道声“谢谢！”也许这声道谢，可能会给他们带去些麻烦。（非常遗憾的是，2015年5月15日，网易全面封杀了我的博客和163邮箱。）

当笔者步入八十高龄时，约百余万言的《草根评说：文革—毛泽东》一书终于脱稿了。尽管出版还是个未知数，寻找全文发表的地方还有一段长路要走，但以书告慰在毛泽东暴政下数千万死难同胞在天之灵的心愿，总算实现了。在这种情势下，行将就火的笔者，**终有可能安闲自得地倘佯在黄泉路上，甚至有可能以舒畅的心情去欣赏那阴曹地府里的幽幽冥色。**

附1、“左派理想主义”亦即无产阶级专政下的乌托邦共产主义；“专制务实主义”亦即一党专政下拒绝民主改革的民生主义。

08- 《八十抒怀》和《我的墓志铭》

作者 于松然

八十抒怀

——笔者抒于2015年4月5日八十生辰

小时候听大人们说“人生如梦”，我不懂。那些年，我怕挨饿受冻没学上，又怕在人的屋檐下睡觉，更怕在那里做梦，因在那里老做噩梦。长大成人后，梦总跟着我，几乎天天都得做，不离形影。

梦，不光有噩梦，还有当了二十年太守的南柯官梦，更有黄粱一枕的美梦，可我从没有做过一个能写成小说的完梦。因为，当我醒来时，留在记忆中的人和事，大多都是断断续续，朦朦胧胧。

我曾是一只苍鹰，已记不清梦中飞翔的情景。

一群苍鹰翱翔在蓝天白云里，远眺龙门山色，近听马寺钟声，沐着洛浦秋风和铜驼暮雨，飞向北邙密林里的上清宫……

啊，那不是梦，那是遥远童年的记忆，我的渴望。但当看见笼架上发呆的苍鹰，我庆幸自己是人，不是鹰。

我曾是一匹野马，已记不清梦中的草原，也记不清如何在草原上奋蹄，驰骋。

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春风得意马蹄疾，欲饮琵琶马上催，万马奔腾山作阵，神驹飞来雷万霆……

啊，那不是梦，那是百读不厌的诗，我的向往。但当看见上了笼套的马，我庆幸自己是人，不是玉花骢。

我竟然还曾是一条狗狗，但已记不清在梦中怎样向主人摇头摆尾，纵横痴情。

一条哈巴在进餐，看上去比我三四十年前吃得好；又看见牠身上那套巴儿装，显然比我三四十年前穿得漂亮、干净。

啊，那不是梦，那是都市里的一道风光，我的憧憬。但当看见牠们紧跟主人跳跃起舞时，我庆幸自己是人，不是巴儿因哈得宠。

梦中，我喜欢马的仁厚，赞扬狗的忠义，讴歌鹰飞悠然；醒来，耳濡目染的一切，似乎都是那么真假难辩，模糊不清。

不管你愿意不愿意，梦总缠住你不放，直把你缠得弄不清什么是梦，什么是醒。

当看见有人举枪瞄准飞翔的苍鹰时，吓得我出了一身冷汗！当看见驯马师扬鞭抽打时，我在颤栗，就像当年红卫兵用皮带抽打我时那样彻骨疼痛！当看见被主人们放逐的狗在街头流浪时，仿佛我又跌落井底，盼望“更上一层楼”的先生、朋友们，不要搬石块往井里扔！

我不愿做梦，却深陷于反复无常、诡秘莫测使人浑浑噩噩的梦幻中。

——世代英豪，似梦非梦宛如梦；人间附庸，似醒非醒恍若醒。恰似曹霁《梦》中所题：假作真时真亦假，无为有处有还无。

（2015.4.5 首发于网易博客，后遭封杀）

我的墓志铭

铭者：于松然（曾用笔名：一介匹夫、ysrr0405）

光阴荏苒，来去匆匆，2010年4月5日，我已走过了七十五个春秋的人生路程。举目回顾，岁月乖谬，诸多遗恨，尽囊心底。十四年贫困，八年军旅，十二年流配，耗尽了充满活力的前半生。后半生与砖石灰砂为伍，栖栖琐琐，直抵黄昏。世纪之初走出工地，面对西风残照，坐在麻将桌边，砰砰啪啪地消磨暮日，打发余生。

四十多年前，一位老农曾对我说：“你大难不死，必有后福！”苟且偷生到七十五，何福之有？

一日，忽有所感，遂提笔写了个纪念“七一”的文章——“中国出了个毛泽东”，贴到某《毛泽东论坛》上。不料，文章一出，招来一阵喧闹。一位最终同意放行的版主恶狠狠地骂道：“疯狂如是者，鲜！人能狗屁者，能！”在“同意放行”后，发出“立此存照”的威胁，大有举兵讨伐或“秋后算帐”之势。果如是，有人不待“秋后”便骂将起来：“狂徒”、“台毒”、“狗东西”、“大傻B”等等，污秽之声不绝于耳。但毕竟是网络时代，虽有“主旋律”之剑悬顶，却也难以再用“舆论一律”扼杀一切呼声。在辱骂声中，不同声音也迸发了出来：“入木三分”、“一针见血”、“非常透彻”等文字跃然网上，更有甚者，竟直呼：“Great article!”倍受鼓舞的我，一个长期在思想强暴下见无知唯唯称是、遇权力谦谦躬腰的软骨患者，一个长期逆来顺受、奴气十足的丑陋的中国人，腰板居然硬挣起来，要在苟延残喘的风烛晚年，只身搏击，傲然为自由立言：用证词与独裁者的谎言、野蛮、邪恶抗争，以书告慰在其暴政下数千万死难同胞的在天之灵！于是，2006年5月，年垂古稀的我，与搜集、鉴别资料的同时，直书《评说文革》，开始了不自量力的艰难跋涉！

高血压曾使我一度搁笔，心绞痛还差点要了我的命。盖因我不善疏导情感：有时写着写着便拍桌子，发泄凝集于心中的愤懑；有时写着写着已泪流满面，甚至情绪失控而大放悲声。经验训迪于我：评述需要感情，更需理性；只有正大而深刻的理性，才会有丰富而高尚的感情。

病魔窥伺的威胁，使我不得不在计划尚未完成之前，抢先发表一些粗糙尚待校勘的初稿，借以圆就以书告慰受难者的心愿。假如一日，我被高血压或冠心病突然击倒，乃至在眼疾的折磨中了却一生，既是未能成书，也会因在网上选发了数十篇初稿而含笑于九泉，陶醉于冥宫！

（2010、4、6首发于网易博客，后遭封杀）